

一 治世语

古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四个阶段性目标。修身是基础，平天下是目标。有才能有抱负的人，都希望通过读圣贤书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理想。只是，有的人想得比较实际，而有的人则比较实心眼儿，把骗人的话也当成真话，把理论性的目标也当成了现实。这就有了我们所说的“迂人迂语”。所谓“治世语”，便是这些道德高尚的先生们关于治世平天下的宏论。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子，有一士曰乐毅。得乐可霸，得孟可王。二士在魏而乃相犀首与张仪，是犹舍照乘而玩^{蜉蝣}丸。不智甚矣。惠王既卒，孟子去魏而适齐；燕昭礼贤，乐毅去魏而适燕。二士既

去，魏何以为国？乐未去魏，阵先至齐，而燕大乱。盖尝以汤武之事劝齐矣。然齐终无兴灭继绝之举。使齐移薛公之位以位孟子，孟子岂但为一薛公而已哉。王者之佐有言无位，宣王不得为桓公矣，况汤武乎？及其致为臣而归，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此千古之痛也。

明·马中锡

《肇言》



得到人才就一定会兴旺，失去人才就一定要败亡。魏国有一个士人叫孟子，有一个士人叫乐毅。得到乐毅，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称霸于天下；得到孟子，就可以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天下人所向往的王道乐土。这两个人才都生活在魏国，可是魏国却任用了犀首与张仪

两个人做宰相，这简直就是放弃手中的明珠却找了一个屎克郎来玩儿。简直太不聪明了。魏惠王死了以后，孟子离开魏到了齐国；燕昭王对人才比较尊重，乐毅也离开了魏国到了燕国。这两个人才都离开了，魏国还指望什么来兴盛自己的国家呢？

乐毅还没有离开魏国的时候，孟子已经先离开魏国到了齐国。那时候，燕国正在大乱。孟子就以汤武时代的政治来劝告齐国的国君。可惜，齐国最终也没有采取继承三代之治，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举动。如果齐国把薛公的位置让出来给孟子，孟子所能做出的成就，难道是薛公那样的人能比得上的吗！（像孟子那样）能辅佐帝王的人才，只能提建议而没有实权，所以齐宣王最终也不能成为齐桓公那样的霸主，更别说成为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贤君了。后来，孟子离开齐国的政治舞台回家养老时，说：“老天爷没有想让天下太平统一呀！如果真的想让天下太平统一，在如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能担负起这样的重任呢？这可真是永恒的感叹呀！

曾凡氏曰：古来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语，堪为豪言壮语。然而也难免迂腐之讥。原因在于，人家本不想用你那一套仁义的说教来治天下，你却自以为非我莫属。那岂不是迂吗？马先生之语就更不堪了。战国战乱时期，你要国君都放下手中的权力和眼前的安危，去学什么“王道”，岂不是痴人说梦？张仪、苏秦之流，固然不像孔孟之徒

那样高雅，但对治理天下来说，确实是比孟子之徒不知现实多少倍。哪个君王肯为了抽象的仁义去拿一个国家做哲学家、道学家的试验品呢？

今罪责官吏，殊无养士君子廉耻之道。必断言徒流杖数，赎之以铜，便非养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责其罪，皆不深指斥恶，如责以不廉，则曰 俎豆不修。

宋·程颐

《程氏遗书》卷十



现在朝廷惩罚官吏，太不顾及士人、君子的脸面，太不利于士人、君子培养自己的廉耻之心。非要明确地计算出犯罪的人应当受的处罚，然后又要人拿钱赎罪，这做法就不是诚心在培养士人的道德。比如古人，责备人犯罪时，都不是明确地指出人家的过错。如果说谁不廉洁时，仅仅是说他‘俎豆不修’而已。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求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歆之意亦可怜矣。虽然，歆亦有罪焉。伐国不问仁人。使歆能为尹翁归、于庭尉，虽贵，其敢干之以私耶？晋颜含言曰：“冯祖思问佞于我，我岂有邪德乎？歆自反焉可也。”纵未及此，贵戚有命，如其所托之非人，以情却之，政复何害，何至拂我之情，以强从人欲哉。昔东汉吴植为宛令，梁冀以宾客托之。植曰：“明将军处上将之门，宜崇贤善，以补朝阙。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当是时，冀以贵戚用事，可谓有权，而植却之无难色。今歆雇以贵戚之命，重于相违，乌得无罪？虽然，朝廷欲天下荐举之公，而使所得者皆得其人以报国，惟申严嘱托之禁，而后可望其至焉耳。不然，缘情徇私，徒长奔竞，未见其可也。”

宋·葛洪

《步史随笔》

河南府的府尹田歆，有个外甥王湛，以善于知人而著称。田歆对他说：“最近，我应该向朝廷推荐六个孝廉。可是最近收到了许多皇亲国戚的推荐条子，不好拒绝他们。我想自己寻找一位真正的名士，以报答国家。希望你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

田歆的想法也真够可怜的了。不过，即使是如此，



田歆也还是有罪的。欲话说“伐国不问仁人”，即处理国家大事不用征得先辈、老师的同意。如果田歆能像尹翁归和于定国那样做事，虽然是皇亲贵戚，谁又敢来向他求私情呢？晋代颜含曾说过：“冯祖思向我请教取悦于上司的技巧，难道我是那种品德很坏的人吗？否则，人家为什么来问我呢？田歆就应该这样地自我反问。”就算不能做到这种地步，贵戚来托情，如果所托的人不合适，也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那又能怎么样呢？何至于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以勉强地屈从他人的欲望呢？过去东汉的吴植做南阳县令时，权贵梁冀托他关照自己的宾客。吴植说：“将军您处在重要的军政岗位上，应该推崇贤人善士，以补充朝廷的人才。可是，自从我处于您的领导之下以来，没有一次听说您称道和推荐一位长者，反而经常托一些不适当的人来谋求职务。我真是不敢接受您的推荐。”在那时，梁冀以皇帝亲戚的身份当权执政，确实称得上是有权，而吴植

回绝他时却一点也不觉得为难。现在，田歆却因为对方是贵戚，就觉得难以违抗反驳，怎么能说是没有罪呢？

当然了，朝廷若是真的想让天下都出以公心来推荐人才，而且想让得到的人才都能发挥作用，必须首先严格地规定不许请客、托人、走后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杜绝弊端，吸引贤人出来报效国家。否则的话，到处都是托人情，走后门，徇私舞弊，只能助长歪风邪气，肯定不会为国家招来任何真正的人才。

曾凡氏曰：绝对真理，常常意味着是做不到的真理。所以，人们会发现“迂言”，有时，甚至经常，就是绝对真理。

传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细腰，国多饿人。”《淮南子》亦曰：“灵王好细腰，民有杀食而自饥也。”人君好细腰，不过宫人，岂欲朝臣与国人皆细腰乎？天下之事，讹谬之远，大率如此。岂独细腰事乎？

宋·王楙

《野客丛书》卷二

《易传》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荀子则说：“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所以当时朝中的许多人因此而饿死了。”墨子又说：“楚王喜欢细腰美女，楚国到处是饥饿之人。”《淮南子》亦曰：“楚灵王好细腰，老



百姓中就有为了节食而宁肯自己忍饥挨饿的。”实际上，君主喜欢细腰美女，那是他自己对宫女的选择标准，难道是让朝中大臣和全国的老百姓都去节食，都变成细腰吗？天下的事，许多极荒唐的错误，都是这样造成的。岂止是一个细腰之事！

曾凡氏曰 看来，此公是把‘楚王好细腰’当成单纯的个人爱好了。不然，这位先生为何不怪皇帝，却来怪老百姓？既是就“天下的事”，就不能如此简单地归因于个人爱好，特别是不能把皇帝的个人爱好当成是个人爱好。一个皇帝想把全世界的版图都划归自己名下，难道也是自己的个人爱好吗？

先儒谓，天下宁可无魏徵之事业，而不可无君臣之义。予亦云。

清·王豫

《蕉窗日记》卷一

儒家的先辈说，天下宁可没有魏徵那样的事业，但不能没有君臣之间的礼义关系。我也这样认为。

自古圣贤，不贵难得之物，况遐方生鲜异味，其传送之艰尤有日不忍见，耳不忍闻者乎？故语及伤害，虽荐奉宗庙之物，亦敕勿复献。此大君之美德，而史册所必书也。

清·尹一会

《四鉴录·君鉴录》卷一



自古以来，圣贤对难得的东西并不看重，又何况远方的生鲜物品，传送起来那么不容易，有许多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苦处难处。所以，一谈到可能造成的伤害，虽然是用来祭祀的东西，皇帝也下旨不要求再进贡了。这才是大君的美德，而且是史书应该大书特书的呢！

曾凡氏曰 旧例,岭南要为皇帝献新鲜龙眼、荔枝。汉代有一位临武长叫唐羌,他给朝廷上书说:这事劳民伤财,死人太多,请免了这种差事。皇帝下诏说:远来的这些珍品,本来是为了给宗庙祭祀用的,既然对人民有伤害,那就免了吧。所以,我们这位老实的学者就把此事当成了皇帝的一大美德,要大书特书。

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唯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剥,毒加百姓。

宋·宋均

引自《宋稗类钞·吏治》

做官的人,只要为人宽厚,肚量大,即使有点什么贪污腐化之类的毛病,也不大要紧。只有那些非常苛刻、精明细致的人,自己虽然可能廉洁,可是却刁钻刻薄,对老百姓的危害最大。

曾凡氏曰:似是而非语。苛察者便是雪地北风,当然令人切齿;“弘厚”而贪污者,实在是餐桌上的老鼠,肚腹中的蛆虫,怎可说是无害?特别是现代中国人都熟悉的“老子一贯正确”,还不如那种让人一眼就看出的明显的坏蛋好对付。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然后吾辈可以得志;谨勿使

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甚矣人君之不可不学也。国家之隆替，社稷之安危，天下之治乱，生民之休戚，君子小人之消长进退，天命人心之去就离合，其端皆基于人君之学与否耳。君诚有志于学，则所闻者正言，所讲者正理，所亲者正人，所履者正行。知古今成败之所由来，而常有惧心；审忠邪关系之不可忽，而常有戒心。制其所治于未乱，保其邦于未危。日就月将，以至于缉熙光明之地。彼觚真怒，候惨舒，动中主情，举无谬旨，如仇士良之徒，自无所投其隙。如此，则藏否毁誉，皆可得其真；功负赏罚，皆可得其当。而跻斯世于太宁之域矣。不然，则本心不正，而脉理皆邪，岂独此曹得以固其权宠而已哉。

宋·葛洪

《涉史随笔》



左卫上将军、内侍监仇士良该退休时，他的党徒在他的私宅为他开欢送会。仇士良教给他们巩固自己地

位和使自己受到宠信的窍门，说：“决不能让皇帝有闲的时候，必须经常以那些奢侈豪华的事物去吸引他的耳目，让他每天都保持新鲜感，常玩常新。这样，咱们这种人就可以得志了。千万注意不要让他读书，不能让他接近那些儒生。他如果看书多了，发现了前代兴亡的道理，心理上产生了恐惧感。我们这种人就该受到排斥了。”

看起来，学习这件事，对于君主来说是太重要了！国家的兴旺，政权的安危，天下的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君子与小人的势力消长，天命人心的去就离合，最根本的都在于做君主的是否学习。如果君主有真心想学习，那么，所听到的都将是正派的言论，所讲出来的话都将是正派的道理，所亲近的都是正派的人，所走的都是正确的道路。知道古今成败的由来，因而常常谨慎从事；明白忠正和奸邪之间的关系不可忽视，因而常常保持警惕；在动乱未发生之前就杜绝它，在国家尚未发生危险时就保证它的安全。这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不断地努力下去，慢慢地就会达到光明的地步。那些靠观察君主的喜怒，把握朝政变化的时机，迎合君主的意志，投合君主的爱好，像仇士良之辈的人，也就再也没有办法钻空子了。这样，大臣们在朝中对人的批评还是表扬，都将是真诚的真实的；皇帝对大臣们的功罪的赏罚，也都将是恰如其分的。而国家也就因此而进入了真正的太平盛世的境界了。否则，朝廷的整个精神、气氛从根本上就不正，做事的种种规矩都是按照

歪门邪道进行的，那结果绝不仅仅是仇某人这种人得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已！

曾凡氏曰：真是聪明人的聪明主意！不知仇士良本人看了该如何说？

汉高祖初为亭长，告归之田。有老人过请饮。因相吕后及孝惠帝、鲁元公主，皆大贵。及见高帝，乃曰：“向者夫人、儿女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帝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唐太宗方四岁，有书生谒高祖曰：“公有相法，贵人也。然必有贵子。”及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弱冠，必能济世安民。”书生辞去，高祖使人追而杀之。

杀之是也；先儒谓其德色如汉高祖者，非也。何者？古今欲为不义，求福于非望者，多起于佞人之庾词。有以激发而成之。当秦隋将亡之时，欲为汉祖、唐宗之所为者，不知其几；为父老书生之谈者，亦不知其几。彼父老书生，偶验于二帝耳，安知其不以告他人哉？以是告他人，而不验者多，是激发他人求福非望，以陷于祸败者亦我。嗟夫，匹夫狂言，天下受祸，其罪可胜诛哉！追而杀之，唐高之远识，过汉高万万矣。史乃谓唐高之追杀书生，惧其语泄，理亦有之。第其意虽私，其事则是。如以为德色，不过女子小人歆慕富贵之心；英雄如季，而肯遽德色于偶然之虚誉乎？

明·张萱

《疑耀·汉唐二高识度》

汉高祖刚当上亭长时，有一次请假回家去种地。有一个老人从他家田边路过，向他家要一点水喝。老人喝水时为吕太后和惠帝、鲁元公主相面，这几个人都是大富大贵的面相。后来又见了汉高祖刘邦，立刻说：“刚才的夫人、儿子、女儿，都是因为您才有贵相的。先生的面相，贵不可言。”刘邦感谢说：“如果真的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一定不敢忘了你今天的吉言。”



唐太宗四岁那年，有一个书生来见唐高祖李渊，说：“您按照相面之术来看，属于贵人之相。不过，您必定有一个大贵人的儿子。”等过了一会儿，见到了太宗李世民，于是说：“这位公子具有龙凤一样的姿态，阳光一样灿烂的仪表，等到日后长大成人，必定能够拯救天下，安顿老百姓。”过了一会儿，等这个书生告辞以后，李渊派人追上去把他杀掉了。唐高祖杀掉那个书生是对的。不过，先儒说他的德性度量像汉高祖，这话可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从古到今，想做不义之事，以达到

非分之想的人，大都起因于小人的阿谀奉承，被人一吹捧，才做出了过分的举动。在那隋朝即将灭亡之际，天下想做汉高祖、唐太宗那种事的人不知有多少；到处传播那位老人或书生那种言论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个老人和书生的话，仅仅是偶然在汉高祖和唐太宗身上应验了。谁知道他们究竟同样的话对多少人说过。拿那种话告诉别人，当然是不应验的多。那也就等于是鼓励别人去追求非分之福，做不可能的梦，让人陷于灾难之中。那么，身受其祸的人也就不在少数。唉，匹夫随口胡说八道，天下的人就跟着他们蒙受灾祸！这种人的罪过，简直是杀头也不足以抵偿！唐高祖能命人追上那书生，把他杀掉，这种见识，超过汉高祖岂止是万万倍呀！史书上说，唐高祖之所以要杀掉那个书生，是怕他到处传播，泄露了机密。从道理上说，这也是可能的。不过，他的出发点虽然可能是自私的，但那种做法却是很正确的。

不过，如果把这个举动也当成是君子之德就过分了；那不过是女子和小人的羡慕富贵之心而已，像刘邦那种英雄人物，怎么会随随便便地轻信人家偶然说出的阿谀之词呢？

曾凡氏曰 这种事，信亦可，不信亦可。即如刘邦，也并非不信。陈胜、吴广起义时，还特意到处传播童谣，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要当皇帝。唐高祖也不是怕泄露自己可能当皇帝的秘密，而是怕他泄露自己准备当皇帝的野心。既然以此说唐高祖胜过汉高祖万万倍，

又说汉高祖根本不信这种胡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难？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推一宽大天地之量，许之自新，莫须相从。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须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坚吾约，则连患未已也。范希文前日西举，发虚声而走敌人。今日又不知谁能为之？

宋·程颢

《程氏遗书》卷二

现在，西部边境上的事要想了结又有什么难的呢？以前的事又有什么可耻的呢？只要朝廷能拿出天地一样宽大的胸怀气魄，允许他们自己改过自新，不要再继续犯边就行了。不过这事也恐怕不容易办到。朝廷的意思，好像是如今不得已，才同意暂时先采取宽大政策。但西夏朝的人如果再继续向朝廷提出其他要求，那就后患无穷了。范仲淹先前带兵西征，靠虚张声势而吓走了敌人。现在也不知道还有谁能做出同样的事呢？

注：“发虚声而走敌人”说法不确。范仲淹是经过长期休养生息，训练军队，增强宋军实力后才迫使西夏和谈的。

曾凡氏曰：某些大儒专好信口胡说，一厢情愿，自以为是。范仲淹为什么能凭“虚声”吓走敌人？宋朝又为什么一败再败？难道仅仅凭着道德就能解决世间的

一切吗？

太后之将奔也，皇上求之曰：无须出走，外人皆友邦，其兵来讨拳匪，对我国家非有恶意。臣请自东交民巷，向各国使臣面谈，必无事矣。

清·光绪皇帝

引自《近代稗海》第一辑

太后将要逃跑时，光绪皇帝求她别走，说：不用出走。那些外国人都是咱们的友邦，他们的军队都是来讨伐义和团拳匪的，对咱们的国家绝对没有恶意。我愿意亲自到东交民巷，去和各国的使臣面谈。肯定就没有什么事了。

曾凡氏曰：此种言论出自一国之君，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外国军队来我国讨伐我国的地方武装，而本国国君要亲自去向人家求情。且不论“外交”上如何，人家既然费力来了，又怎肯为了一句好听话就罢手呢？

自光绪元年至十八年为兄弟不和时代，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为母子夫妇不和时代，终帝之身，两事相为首尾凡三十四年。自古国家之败多起于伦理，家齐而后国治，不诚信哉。

近代·胡思敬

《国闻备乘》

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十八年可以说是兄弟不和时代，从光绪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是母子夫妇不和时代，在光绪帝一生的时间里，两件事相为首尾正好有三十四年。自古以来，国家的败亡大多起因于伦理。由此看来“家齐而后国治”，这话说得真是有道理呀！



曾凡氏曰：中国历代总有人喜欢把国事说成家事，把政治兴衰归因于个人性格和品德。“女人祸水论”是其一，“君王好色论”也是其一。胡思敬这里又创造了一个“家务败国论”！可惜，至今我们身边的胡思敬还是太多。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英之维多利亚即贪财，英人让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买卖之故。此等内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

近代·王小航

《方家园杂咏纪事》



戊戌政变，外人都误会了，以为是慈禧太后反对变

法。其实，慈禧只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政见；也就是说，那纯粹是一场家务纠纷，是家庭内部的权利之争。所以，以我个人之见，若是把主张变法的名誉奉送给她，使她能在政治变革中公然出头露面，那么，皇上也就可以因此而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间长了以后，那些顽固的大臣们也就都无能为力了。（英国的维多利亚就是个贪财的人，英国人都让着他，容忍他，以顾全大局。慈禧废黜两个皇妃，其实也只是因为买卖上的原因。这类事，凡是在京城住得时间长一些的人都知道。光绪皇帝怎么能制住慈禧呢？）

曾凡氏曰：此公之言大妙！妙不可言！这才叫所谓“内中人语”，实在不足为外人道。珍妃为卖官爵，被西太后制了一顿，尔后又借机扔进井里，这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说到政治，说到戊戌变法，岂是只关心太后利益的遗老所能知的？中国将亡，中华文化将亡，中国人要活命，中华文化要继续生存，这才是戊戌变法的实质。此时没有西太后，便有东太后，没有珍妃便有贾妃，没有六君子便有八君子，岂是送给西太后一个改革家的美称所能了得的？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帽则可，补缺当遵部例也，

臣以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匱,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中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近代·胡思敬

《国闻备乘》



近代提倡革命的人,总是借君主专制政治这种理

由作为口实，其实这是错误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四个养子，名叫福恒、福德、福立、福海。这几个人都分别捐了郎中的职名，在户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候补。李莲英极力请求西太后帮忙，想让这几个儿子早日谋得实位。一天，刑部尚书葛宝华人见，西太后就托他办福海的事。宝华说：“要是给他个小黑布帽戴还可以，要想补缺就要遵循部里的惯例。我可不敢拿这种事自己当家。”西太后听了以后也哑口无言，不敢要求他破例。鲁伯阳向珍妃进贡了四万两银子，珍妃在光绪皇帝面前吹了枕头风，于是光绪派他出任上海道台。江南督都刘坤一知道这事以后，鲁伯阳到任不到一个月，马上就被弹劾免职了。这表明在人事任用方面，即使是君主也不能自己独断专行。文宗皇帝外出狩猎，随从官提款过多，管财政的宝鋆坚决不奉诏拨款。穆宗皇帝大婚，内务府财源枯竭，想从部库借款，部臣力争，说是府部界限非常清楚，不能随便混淆，不能马马虎虎。西太后一开始大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进宫向太后进谏，好几次差一点儿被罢免了。李鸿章等人虽然那么善于迎合，也不得不借海军报效的名义，以便遮掩人民的耳目。这又说明，用财的权力，君主也不能自己独断专行。同治、光绪年代以后，政治比较衰败的时候还是这样，那么，以往和平年代的情况也就可以知道了。

曾凡氏曰：多么漂亮的辩护词啊！某大学者阅此可以开怀一笑了！

耶稣教,每月数日祀天主,剪牲陈饌,随其所有,质之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之义,僭甚矣。或曰:“贵同虽殊,皆乾父坤母而为之子。先王制礼,乃大有限制。诸侯而下皆不得一献以答生成,于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泽而陈者,皆四方郡国之筐筐,田野细民之拮据也。贱者修其物,贵者修其仪,普天之下,固未尝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亲,亚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鸡豚,庖人司烹宰,妇孺洁器具罍酒醴,奉而进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妇而已。余人未尝辄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职,庶人谨身节用,以供王税,于义备矣。因是而推,斯民和乐之气,即为德馨。怨恫之声,即为腥闻。诸吏之浚民自养者,即盗窃天地神祇之牲豢粢盛而食者也。利固是解人,当时何不以此告之。”

清·张尔岐

《蒿庵闲话》卷一

耶稣教的人,每月好几天祭祀天主。做礼拜时,供品丰富,有什么拿什么。那种规模气魄,比起皇帝祭祀天地、诸侯祭拜山川的礼节来,简直是越轨得太过分了。也许有人说:“人的身份虽然有贵贱的差别,但都是由天地孕育、父母生养的后代。先王制定礼仪时,却大大地加以限制,诸侯以下的人,都不许对天地祭祀,以表达对天地造化的感激之情。这不是叫人心灵太过



不去了吗？我认为：“这样说不对。皇帝作为天之子，他在祭祀时所贡献的祭品，都是天下各国贡献的物品，是天下的老百姓辛勤劳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产品。生活贫困的人勤勤恳恳地创造财富，富贵的人诚惶诚恐地培养自己的德行，整个天下可以说是都在祭祀天地。就比如在家孝敬自己的尊长这件事吧，大家去种地，牧人放牧，厨师做饭，妇女洗洗涮涮、端盘子端碗，最后把东西进献到父母二位老人面前的，只是长子和媳妇两个人而已。别的那些人，谁也不能亲自上前献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真的想对老天爷表达自己的敬意话，士大夫各自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老百姓各自勤恳劳动、勤俭节约，以便按时缴纳税赋，就算是完成自己对天的义务了。从这个道理推论，老百姓和睦安宁的气氛，就是国家之福；老百姓的怨怒之声，就是国家的灾难。各种官吏，如果有搜刮老百姓的财产

而肥了自己的，就等于是盗窃了天地和神仙所应该享受的贡品而自己享受。那种认为人人都有祭祀天地的权利的人，为什么不拿这个道理告诉大家呢？”

二 涉世语

要治世，便先要涉世，即先要进入这个世界，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所以“涉世语”，也就是处世语。即关于人应当怎样生活，特别是应当怎样“做人”的教导。

中国社会是一个血缘伦理社会，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关系网。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有所成就，有所作为，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关系网，必须能够利用这个关系网。也就是必须学会如何使自己在人群中生活，学会在人群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学会在群体的互动关系中达到自己的特殊目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最重视做人处世的。

其实，现代社会学也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处世。不过，作为学问的处世艺术是每个人求生所必备的知识

或常识。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处世，往往被那些饱学硕儒之类的道学先生们赋予了神圣而高尚的道德性质。处世不是艺术，不是求生技巧，甚至不是一种文化理想，而是一种带有宗教气味的伦理道德行为，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方式和人格的标志。

这些涉世语本身也许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是代表了人类生活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崇高的精神方向。但它们惟一的不足就是不切实际。人们倘若可以遵照这些教导生活的话，人类也许会在一天之内攀上人类精神的顶点，完成道德和灵魂的进化。人便从此成为宇宙中惟一能够达到完美境界的事物。

然而，即使在理论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人类只能永远地慨叹，只能永远地追求，但却不可能使自己成为神明。因此，人类总是很清醒地区分理想与现实，区分目标与出发点。而当有人执拗地要用理想代替现实，用目标代替出发点时，我们只好怀着深深的敬意对他说：你真迂！特别是当有人把别人骗他的话当成了真理，同时又坚持要大家都相信那骗人的鬼话时，我们就只能用怜悯来取代最初的那点敬意了。你若不信，便请读一读这些出自道德高尚的君子之口的教导吧！

人只有自爱之私，便自天地闭塞，贤人隐。有气节者，便自爱其气节；有事业者，便自爱其事业；有技能者，便自爱其技能；有文学者，便自爱其文学。如此便狭小了。人莫不自爱，不知自爱，反是自害。人但能看

此心与地一般，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底意思。则凡气节事业技能文学见之，犹苟屣耳。是之谓大爱其身。

明·郑善夫

《经世要谈》



人若是只有自己关心自己的一片私心，那就会天地闭塞，贤人都会隐没不现。有气节的人就会自己爱自己的气节，有事业的人就会自己爱惜自己的事业，有技能的人就会自己珍爱自己的技能，有文才的人就会自己珍爱自己的文才。这样一来，人生的境界就狭小了。人都自爱，不知自爱，就等于是自害。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心身看得和那天地自然一样，就会培养出自己像天地育化万物那样的境界。如此一来，那些气节、事业、技能、文学等，与之相比，就等于是破衣烂鞋一样

了。这才是高级的自爱。

孔子之穷，颜氏之夭，或曰 天之未定也 或曰 天之不可诘也。于是苏子教之以天定有后之就，昌黎、禹锡，著论纷纷如。余以为，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寿，则治；大德不受，命穷而夭，则乱。治乱命也。循环之数，不得不然，犹昼而阳明胜，夜而阴浊行。夫岂天之得己哉。……不知春秋荣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谓不知命。

元·俞镇

（学易居笔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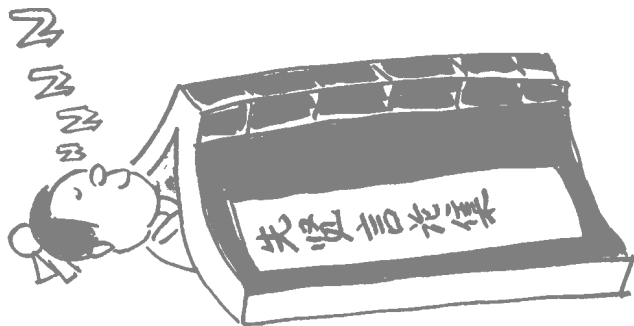
对于孔子的受穷，颜回的短命，有人认为是天还处于混沌未定状态，有人认为是天命不能认真地追究。于是，苏东坡提出了“天定有后”的说法来对这个结局加以弥补，韩愈、刘禹锡，都纷纷著书立说，加以自己的

解释。我认为，有大德的人必然能得到他应得的位置，必然得到他应得到的寿命，那么天下就是太平安定的；如果有大德的人不能得到相应的命运，短命而死，那么天下肯定是大乱的。治和乱都是天命。循环的规律是不得不那样的，就像白天阳气胜，而夜晚阴气弥漫一样。那怎么是天能够自己决定的呢？……不懂得春秋演变生命生死的道理，而只会在那里怨天怨地，那才叫不懂得命运呢！

熟思平生历试，不堪回首。间 阅旧稿，深恨学不向前，身心荒怠，可忧可愧。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 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汨。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穷通寿夭，自有命焉，宜笃信之。

明·吴与弼

引自《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



细想自己一生所参加的历次考试，真是不堪回首。

偶然翻阅旧稿，真是恨自己的学问不长进，身心都荒废怠堕了。既可忧虑又可惭愧。如今应当做的就是，每天早早起来，洗刷干净，等家庙的礼拜活动进行完毕之后，就要正襟端坐，好好读圣贤之书，以便使自己的心收回来，不为外物所动。等到晚上困倦了就上床睡觉。别的事都不应当再操心。贫穷与富贵，长寿与短命，这都是命运规定好了的，应该真诚地相信。

仁者无敌，是绝大兵法。

清·王豫

（蕉窗日记》卷一

仁者无敌，这句话是最高级的兵法。

曾凡氏曰：不知是否宋襄之仁乎？刘备之仁乎？

或问荥阳公，为小人所詈辱，当何处以处之？公曰：“上焉者，知人与己本一，握呶何者为詈，何者为辱？自然夫忿怒之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与此人等也。如此自处，忿心亦自消也。”

宋·吕希哲

引自《仁学规范》卷八

有人问荥阳公吕希哲，如果被小人辱骂，应当怎样对待？他回答说：“上等的人，明白别人与自己本来就



没有什么区别，哪还存在什么詈骂，什么侮辱呢？自然也就没有愤怒的想法了。次一点的人，可以自己静想：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若是回敬他，就是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和他处于一个档次上了。能这样想问题，愤怒的心情自然也就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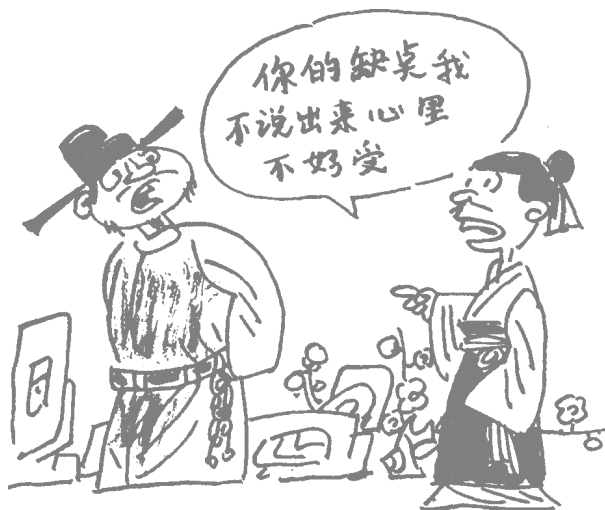
门人有曰：“吾与人居，视其有过而不告，则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则奈何？”曰：“与之处而不告其过，非忠也。要使诚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则言出而人信矣。”

不能动人只是诚不至。

宋·程颢

《程氏遗书》

有门人对程颢说：“我和别人在一起生活时，发现人家有缺点毛病，如果不对人家说出来，就觉得自己心



里不能安宁；可是如果告诉了人家，人家又不肯接受，那该怎么办呢？程颢回答说：“和别人一起生活而不能把别人的缺点告诉人家，那就是对别人不忠实。关键是在于，你还没有对人家说话之前，心里就有十分的诚意，那样，你的话一说出来人家就相信了。”

不能感动他是因为没有诚意啊。

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者，犹强起之，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乃求自举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贵，则得志便骄纵，失志则便放旷与悲愁布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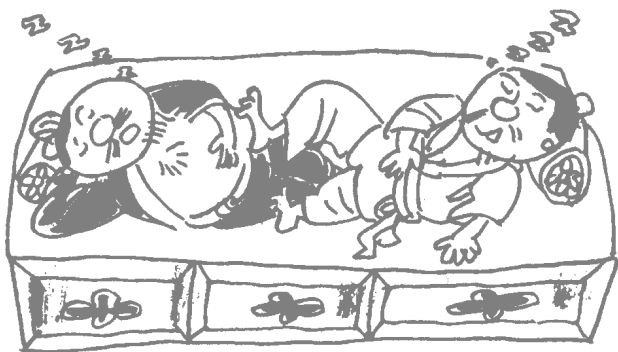
宋·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汉代选“贤良”这种名誉职务，还要靠适当的人推荐。比如公孙弘这个人（虽然大家对他的评价不高），也是朝廷极力征召，他才前来赴任的。到了后世，所谓“贤良”都是自己求人家赏赐提拔的了。如果真的有人说，“我心里只是想当面见见皇帝，对皇帝亲口直说自己对天下大事的见解”，那也是可以表彰的。如果一心只想着通过这条路求富贵，那么肯定一旦得志就要骄傲放纵，一不得意又要放任自流，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了。

曾凡氏曰：宋儒最好说些自以为高尚的话，不管别人信不信，自己先就信以为真了。若真的有人说“我只望廷对，欲直言天下事”，恐怕也是一个书生的不切实际的空论。何况，朝廷是否听你的“直言”还成问题。更何况，宋代后来的君主，一个个懦弱无能，只管自己享乐，谁又真的关心天下大事，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呢？



齐王见颜闾曰：“闾前。”闾亦曰：“王前。”严光见光武，卧不起。及共卧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则高矣，然君臣之礼可废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盖高而无礼者欤？以是为训，吾恐无礼于君者，有以藉口也。

明·祝允明

（读书笔记）

齐王见着颜闾，说：“你过来。”颜闾也说：“大王你过来。”严光见汉光武帝时，躺在床上不起来。等到俩人一起睡觉时，又把脚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这两个人啊，要说也算是高洁之士了，然而，难道连君臣之礼都不要了吗？就算是在朋友之间交往，也不能那样啊！难道他们不是自恃清高，而不懂礼貌的人吗？以他们为榜样，我怕天下那些对君主不尊重的人，都该有借口了。



王摩诘与魏居士书云：“近有陶潜，不肯把版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见一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

唐·王维

引自清·张尔岐《蒿庵闲话》

王维给魏居士的信中说：“近代有一个陶潜，因为不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弯腰鞠躬地拜见督邮，就自己挂上官印，离职不做官了。后来，他穷到要饭的份儿上。他在诗中写道：‘叩门拙言辞。’显然是经常靠要饭维生，而且自己也觉得惭愧。我曾见过一个督邮，人家安分守己，靠几顷公田过活。陶潜因为不能忍受一时的羞辱，结果不是弄得一生惭愧吗？这就是算不开人我之间的关系，忘记大节，而专守小节，瞻前不顾后造成的后果。”

注 清代张尔歧在其《蒿庵闲话》中评价说 王维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水平。据他的这种说法而推论，传说中他靠一曲《郁轮袍》而取悦安乐公主，得到了进士的称号，这事肯定不是别人编造出来的了。可是，当他被发配到南方，握着郑虔的手，一边落泪，一边吟咏“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的诗句时，与后来从安禄山的俘虏营回到唐朝听受处分时，再想想当年的陶潜，那种拄着拐杖，受着风寒，到亲友家求助的境界，究竟谁惭愧谁不惭愧？

曾凡氏曰：王维是高人隐士的代表，但其为人确实有不高之处。自己骨头软，还要说陶渊明不懂人情世故。结果自己也并不舒服。张氏说得不错：恐怕王维讥讽陶渊明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惨状吧？

又，此条也可证明前一条祝允明对严子陵的批评是何等的荒谬了。

谚云，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朝市间隐者不预焉。若岩栖涧汲，子然瓢笠，何外求之有？使李贽不客通州，达观不游长安，虽弥天之网，何能累之？彼犹竟胜于方之内，宜其及也。

明·谈迁

《国权》卷七十九

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朝廷和市场，这是隐士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如果能栖身于山岩与溪水之



间，自己独身一人无牵无挂，那还何必要向外去求呢？假使李贽不到通州去居住，达观不到长安去学，虽然有天大的法网，又怎能对他们造成危害呢？他们自己要那样到人世中去争名夺利，该着他们遭难了。

注：达观为明代与李贽同时的一位和尚。

曾凡氏曰：凡此类言语，都是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讲。岂不知李贽与达观并非因为要做官争名才遭到杀害，而是因为反叛传统文化，是对儒教造成了精神上的威胁才被视为敌人。纵使躲在深山，除非不开口，开口便是罪过，又何能躲得过去？

范宁尝谓王弼、何晏罪深桀纣，蔑弃典文，幽深仁义，游词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欲，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

明·钱琦

《钱公良测语》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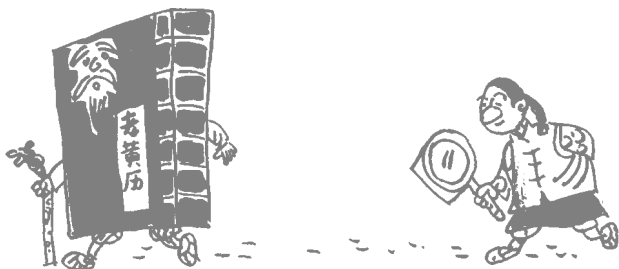
范宁曾经说过，王弼、何晏这两人的罪孽实在是比桀纣还要深重。他们放弃了圣人的经典，闭口不谈圣人所提倡的仁义思想，弄些空洞浮华的词藻来引诱人们，骗取年轻人的信任，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都改变了自己的信念，以至闹得礼崩乐坏，整个社会乱成了一锅粥。这种遗毒流传下来，到今天还在害人。桀纣那种人，就算是一时间很残暴，只不过是闹得自己身败名裂、亡国辱身而已，怎么能改变老百姓的信仰呢？所以，我以为，为害当代的罪过比较轻，为害后代的罪过就严重；自己身败名裂的罪恶是小恶，迷惑众人的罪恶是大恶。

曾凡氏曰：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官司”都是扯不清楚的。王弼、何晏两人的“罪孽”之所以大逆不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注释了一本《老子》。这也是中国历代文字狱兴盛的原因之一，也是前些年所谓一本书就可以亡党亡国的怪论的精神根源之一。钱某自以为很高明，尚不为过。因为他本来就生活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只是我们今天的许多人，仍抱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文化价值和不同的精神理想，实在有点可惜。

里巷之谈，动以古为诟戏。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遗法而不敢违者。岂天下之大，国家之

重，而古人成法反可违耶？

元·许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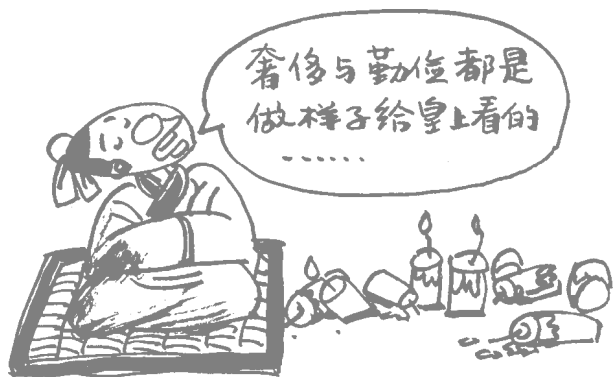
人们日常闲谈，动不动就喜欢拿古代的例子来开玩笑，嘲弄古人。要知道，今天人们口里所吃的粮食，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古人留下来的不可改变的遗法（即传统、经验、习惯等）。怎么到了对待天下和国家的大事时，反而可以违反古人现成的惯例呢！

曾凡氏曰：人类学家许烺光，说中国人只能踏着祖先留下的脚印走，看来是没有说错。

寇莱公寝处，一青帟二十余年。时有破坏，益命补茸。或以公孙宏事靳之，公曰：“彼诈我诚，虽弊何忧。”然知邓州时，制花蜡烛，不点油灯。罢官之日，厕所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俭也。青帟之弊，岂真异于公孙。

明·张萱

（疑耀）



寇準的卧室里，一直是挂着一幅黑布帐子，二十多年都没有换过。有时候帐子坏了，也是叫人补上了事。有的人就拿公孙宏的例子跟他比较，向他提出质疑。他说：“他那样做是出于虚伪，我是出于真诚。就算别人有看法，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在出任邓州知府时，却又自己命人制作花蜡烛，从来不点油灯。到离职那天，厕所里蜡烛流下的蜡油遍地都是，都堆成了堆。为什么这时候这样地奢侈，而那时候却又那样勤俭呢？当年用黑布蚊帐的毛病，难道真的和公孙宏有什么区别吗？

曾凡氏曰：看来，此公对这其中的微妙之处确实是不知道了。寇準是有名的忠臣，但也是在朝野上下有声望、有权力的大臣。这样的大臣，都要随时预防皇帝的对自己的猜忌，以免杀身之祸。在朝中做官时，用青布帐幔，确实有虚伪的一面，确实是为了向皇帝表白自己的清白和俭朴。关键是后来，移居邓州和退休之后，

突然地奢侈起来，这里就大有奥妙了。不止寇準一人，别的人也这样做过。其目的就在于，用这种方式告诉皇帝：我这人没出息，没有什么野心。你看，我这么荒淫奢侈，怎么能干成危害朝廷的阴谋大事呢？可惜，张萱公那么仔细地研究历史，竟没有理解这个奥秘。



世人相见诉穷，便是贪欲影子。这穷字断送多少豪杰 试看先辈赫赫者，大段穷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处便不可不思。

邹吉水语

引自清·张尔岐《蒿庵闲话》

世上的人，如果相互见面就诉穷，那就是贪得无厌的表现。这穷字也不知道断送了多少英雄豪杰的前

途！试看先辈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大都经过艰难困苦
的磨难历程。人家怎么就能忍受过来的呢？为什么
现在的人就不能忍受呢？这其中的区别，不能不仔细
思考啊！



厚于淫祀，薄于祖宗 厚于妻子，薄于父母 厚于巫
卜，薄于医药 厚于嫁女，薄于教子 厚于异端，薄于贤
士 厚于夸诞，薄于信实 厚于屋室，薄于殡葬 厚于惧
内，薄于畏法 厚于货屠，薄于仁义 厚于靓人，薄于责
己 厚于祈福，薄于修德。

明·俞贞木

《厚薄论》

热衷于敬神敬鬼啊，甘心冷落祖宗；对妻子百般讨好啊，宁肯冷落了父母；热衷于跳神算卦啊，不舍得花钱买药；倾家荡产嫁闺女啊，没闲工夫教导儿子；热衷于异端邪说啊，不肯礼贤下士；整天夸夸其谈啊，不肯脚踏实地；热衷于盖房子啊，让先人的坟地长满了草；很怕自己的小家吃亏啊，不怕国家的法律威严；热衷于赚钱啊，不要脸皮；那么会挑剔别人啊，可惜不知道自己黑；热衷于向天祈祷求福啊，就是不关心自己的良心。

曾凡氏曰 这一篇《厚薄铭》写得极其畅快淋漓，描画世人嘴脸极鲜明。本不失为一篇“快人快语”。然而，此公生活于明代，即李贽、徐渭、汤显祖等人生活的时代。此时乃中国文化思想大解放的时代，所谓的异端邪说纷纷出笼，商人阶层、市民阶层迅速兴起。因此，俞公的铭文中把“异端邪说”和经商等都当成了世风日下的标志加以攻击。若细究起来，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明白人的明白话。读者于此等处也该自己认明。

三 修身语

古人有‘人生三不朽’之说。

所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立功、立言’。即作为一个人,首先要完成自己的人格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人品出众的‘君子’、‘贤者’或‘圣人’。这才算有了在社会中立足的根基。其次,就是要对人类、对社会有所贡献,要完成某种事业。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者之一,都可以说是‘立功’;即完成了某种人生的功业。只有一个人的道德高尚,人格堪为人师,又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人,才有资格向人类说三道四,才可以对人类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所谓“立言”,指的就是向人类社会发表自己的正式意见,比如著书立说之类。

“人生三不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

文化的价值结构的一种特别明确而独特的表达。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倾向于实用的实践的行动的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则是倾向于抽象的伦理的道德的价值。“人生三不朽”的排列次序，与作为个人人生目标的“修齐治平”的排列次序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把道德人格放在第一位，而把实践和理论放在第二、第三位。所以，中国人讲究首先要“修身”，然后才能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做人的基础，是一个人在人世上生活，在人群中活着的基本功。不修身，连一个真正的人都算不上，根本就不配谈什么事业。

不过，由于儒家理论的逐渐抽象化，由“先贤”“圣人”们提出的人生目标和人生理想也都染上了形而上学的甚至是宗教化的色彩。特别是在理论的层面，许多有意义的理想性的说法，渐渐地都变成了非常空洞却又带有神圣意味的刻板的教条。人们只会说不会做，甚至只愿说不愿做。或都竞相争比，看谁能说得最高尚最伟大。于是就造就出一大批不懂人生不懂生活的书呆子，造就出一大批自以为是的假圣贤假君子。

这里的“修身语”，便是一些书生意气风发的高谈阔论，也可以说是一批高尚的傻瓜的无用的空谈。

颜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饮，孔子贤之。非贤其安贫乐道也。安贫乐道，独行苦节之士皆能之，何足为难颜子。颜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个王

佐。当是时，不特仲由、子贡诸侪辈拉他不去，即其师孔子，栖栖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颜子只是端居不动，而且有以身讽孔子之意。其后，孔子倦于辄环，亦觉得陋巷的无此劳攘，厄于绝粮，亦觉得簞瓢的无此困顿。又其后居夷浮海，毕竟无聊。原归宿到蔬水曲肱地位，而后知颜子之早年道眼清澈耳。所以三叹其贤也。古人云：‘智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于师，乃堪传授。’其颜子之谓耶！

明·陈继儒

《狂夫之言》卷一



颜回能够居住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以至孔子大加称赞，把他视为贤人。孔子并不是推崇他的安贫乐道。安贫乐道，每个具有特立独行精神的有气节的苦行之士都能做到，对颜回这样的人又有什么难以做到的呢？颜回是王佐之才。在粗茶淡饭和破屋陋巷的人生中，却深深地隐藏着这样一个王佐之才！在那种

时候，不但仲由、子贡等同学朋友辈不能拉走他，即使是他的老师孔子，那么恹恹惶惶地，何等急于救世，而颜回只是自管自地安居乐业，毫不动心，而且有以自己的行动讥讽老师孔子的意思。后来，孔子已经厌倦了到处游说的流浪生涯，也感觉到像颜回那样地居于陋巷的生活没有这种烦恼和劳累；在陈蔡等地绝粮被围之时，也觉得像颜回那样粗茶淡饭的生活没有自己这样的尴尬。另外，他后来漂洋过海，流浪在异国他乡，毕竟很没意思。在以前，孔子曾表达过对蔬水曲肱地位的向往，后来的遭遇才使他知道，颜回早年就已洞明一切，达到了别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所以，孔子才三次赞叹颜回之贤啊。古人说：“智慧与老师一样高的人，只能达到老师一半的成就；智慧超过老师的人，才值得教师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他。”这话多像是对颜回说的呀！

曾凡氏曰：这话若是别人说出倒也无妨，偏偏是以“狂夫”而自居的大名士陈继儒，也会说这种话，倒叫人好笑。颜回不过是一象征，是一个招牌，究竟有几人相信，从来就是一个问号。若把他当做榜样，不但捞不到圣人的名头，而且也别指望出人头地，岂非鸡飞蛋打吗？

有所为而为善，便是不诚 不诚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为善者，有希图报应而为善者。世欲衰薄，不堕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为便不可为人，

真实改过迁善，方是两脚踏实地。

清·张尔岐

《蒿庵闲话》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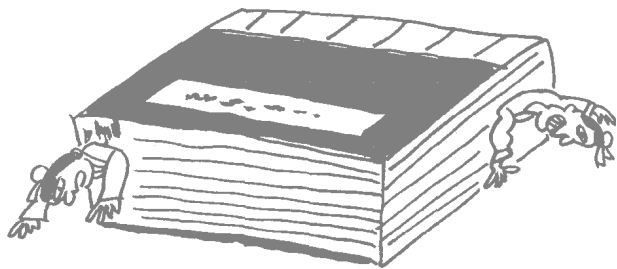
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去做善事，那就不是诚心；不真诚就是不善。有的人是为了让人家看才去做善事，有的是为了能得到上天的报答才去做善事。世上的风俗已经衰退，人心都不那么厚道了，不是为了这种目的，就是为了那种目的。如果能明白，做善事是每个人本分上的事，不做善事就不算是一个合格的人，真心实意地，从心里改过从善，那才是脚踏实地地做人呢！

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

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

宋·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年轻人，不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都容易削弱他的远大志向。至于读书写字，这是和儒者的身份最相近的事。可是，一旦把写字变成了爱好，也同样影响一个人的志向。比如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如果说他们是好人还差不多，可是有谁见过精通书法的人真的懂得大道的呢？平生的精力一旦用到了这方面，不但浪费时光，而且影响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由此可知，这也是玩物丧志的一种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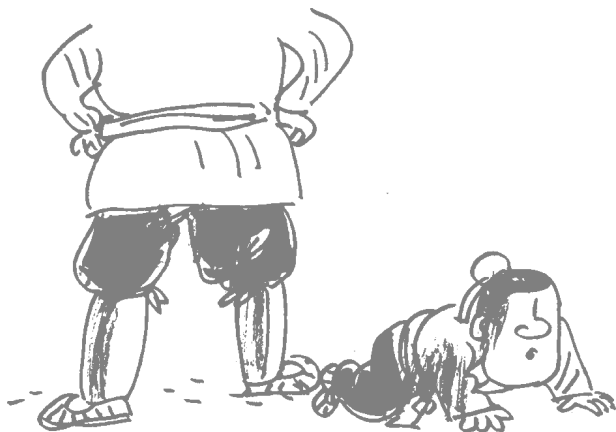
曾凡氏曰：程先生此言从做学问的角度说是对的，然而此中却暴露出中国古代士人的一大弊端，即死读书，读死书。所谓述而不作，即是只讲圣人的道理，而不讲自己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更不讲自己作为一个人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要求。由此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文化人都显出与现实相脱节的无能为力。

辱之一事，最所难忍。自古豪杰之士，多由此败也。窃意辱之来也，察其人如何，彼为小人耶，则直在我，何怒之有？彼为君子耶，则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审辱之所自来，一以怒应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欤。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礼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礼之未至也。厚也，礼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恕之。彼何罪耶？然则厚矣，礼矣，彼复薄虐堵，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几君子矣。

明·王达

《笔畴》卷上



受他人的侮辱，这是一个人最感到无法容忍的事

情。自古以来的豪杰之士，许多人都是在这类事情上失败。我想，如果碰到了侮辱，应该先观察那个侮辱自己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小人，那么真理显然是在我这一边，我有什么可生气的？如果他是一个君子呢，那么道理肯定是在人家一方，我又生得什么气呢？世上的人，大多不观察那侮辱的来源，一律以愤怒去回应。这就是他们之所以相互仇视相互为敌的原因。书说：“必须有忍耐性，才会有期望中的收获。”意思正和我说的一样。

我以宽厚之心待别人，别人以刻薄之情对待我，那不是人家刻薄，主要还是我自己的宽厚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我以礼义待人，人家却以冷脸虐待我，那也不是人家虐待我，还是我自己的礼数不到家。宽厚、礼貌，这些事都是自己主动去做的，刻薄、虐待，我自愿宽恕他，他又有什么罪呢？然而，我也宽厚了，也礼貌了，人家还是那么刻薄，还是虐待于我，那只能怨我的命不好，怎么能怪罪于他人呢？因此，不怨天，不记恨别人，这才是近乎君子的人啊！

妇人不幸而遭变乱，为人所执者，只有一死，乃称完节，别无他说可自解者。宋建炎间，金兵下广陵，有晏氏者，元献公殊四世孙女。年十五，从其叔孝纯官广陵。广陵破，氏在俘囚中，金人欲胁而污之，不从。或处经，或投井，皆以救获免。主母爱之，抚育如己出，年至三十一岁，犹无恙也。节则节矣，国破家亡，乃偷生

十五年，欲何为乎？

明·张萱

《疑耀·妇人遭乱》

一个女人，如果不幸遭遇变乱，被人家抓住。那就只有一死，才能算得上是保持了自己的节操。别的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解脱的理由了。

宋代建炎年间，金兵南下，到了广陵。有一个晏氏，是著名诗人晏殊的四世孙女。当时她十五岁，跟着叔叔晏孝纯在广陵的官府生活。广陵城破时，晏氏也在俘虏群中被囚。金人曾想污辱她，她不肯屈从。后来，她或者上吊，或者投井，结果都被人救上来没死成。金国主人的母亲很喜欢她，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养育她，一直到三十一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倒是也算保住自己的节操了。可是，国破家亡，你在敌人的庇护下忍辱偷生十五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曾凡氏曰：这是义正词严的谴责，只可惜选错了对象！你怎么不问朱熹此时在干什么？怎么不问问宋代满朝文武在干什么？一个女人，除了献身于男人，似乎就再也没有活着的理由了。女人失节是失节，男人失节不是失节吗？程朱门徒，大多此类高谈阔论的伪君子、假圣人。而中国传统的官方主流文化的陈腐、堕落、僵滞，就是由这么一班人慷慨激昂地一代一代地造出来的。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程颢

《河南程氏遗书》

被饿死是极小的小事，如果不慎失去节操，那可是天大的事。

注：有弟子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快要饿死了，到底是保命要紧，还是保住节操要紧？他就说了这句名言。



曾凡氏曰：这是一句千古名言！因为这一句话，不知有几千百万妇女丧失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和生命权利。上面一段，张萱讲的‘妇人遭难’只有一死了之，也是出于程公之教。那么，掌管天下的人失节，究竟该当何罪呢？好像至今没有人说过。

凡事只须平心。寻常犯权贵取祸者，多是张大其事，邀不畏强御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处得平稳妥帖，彼虽不乐，视前则有间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非以避祸，盖此乃职分之当。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则发处已自不是矣。

宋·吕祖谦

(宋稗类钞·尚论)



什么事只要平心静气就行。平时那些得罪达官贵人而招来灾祸的人，大都是好咋咋唬唬没事找事，以图博得个不怕强暴的名誉。所以，人家那些权贵人物心里觉得愤愤不平。如果处理得平稳妥帖，他们就是心里还不高兴，但比起前面说的那种情况还是大不一样了，不过，之所以不一定要把事情闹大，不是怕得罪权贵，而是从处理各种关系的角度来说应当这样做。若把这些(避祸和待权贵)看成一件事，那么，从出发点上

说就已经错了（注：意思是说，不是为了避祸才不得罪权贵，而是为了不闹出乱子）。

曾凡氏曰 中国人都知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生格言。这也是中国人许多高级马拉松现象的精神背景之一。吕公之言，其精髓就在于此。

朱文公告陈同甫云：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著也。此论于同甫可谓顶门上一针矣。余观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妇，皆谓一能胜予，而凿龙门，排伊阙，明德美功，被千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乐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谗历变，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乡党，在宗庙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蒹葭，堕三都，诛少正卯，便有一变至道气象，此皆所谓真正大英雄也。后世之士，残忍刻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忌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排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生死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度者。况望其立大节，弥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无他，任其气稟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宋·朱熹

引自《宋稗类钞·尚论》

朱熹对陈亮说：真正的大英雄人物，都是从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那种境界中一点一点地做起，慢慢成长起来的。只凭一点热情，不管不顾地猛冲猛撞，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说这话，可是在老弟你的脑门儿上猛刺一针啊！我觉得，大禹这人不骄不傲，一般的老百姓都自以为比他强许多。可是他开凿龙门，疏通伊阙，那种高尚的美德和丰功伟绩，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后代的人民。周公不傲慢不苛刻，关心人民，对下级谦和，经过三年艰苦征战，血流成河，尸伏遍地，经受了无数的诬告陷害和危险的打击，才最后安定了周朝的天下。孔子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的，在朝廷和大庭广众中就像是连话都说不圆满的人。可是后来处理朝政时，接连做出却莱裔、堕三都、诛少正卯，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人感到一变而达到了道的境界。像这些人，都是所谓真正的大英雄。后代的人，残忍苛刻，能聚敛财富、会杀人的人，都算是有才华；在邻里之间打架骂人，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人，都叫做有志气；会打小算盘，会为自己谋利益，会排挤他人，搞阴谋诡计的人，就被视为聪明有智慧。可是，一旦碰到利害得失的矛盾冲突关头，或是生死祸福的人生关卡时，没有谁能够不斤斤计较、手忙脚乱、张皇失措而丢人现眼的。这种人还能指望他们有远大的志向，临危受命，平定社会的动乱，挽救天下的局势吗？这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主要是这种人太放纵自己的性格，把愚昧当做智慧，一意孤行，固执己见，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根本就不懂得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这样一种人生修养。



曾凡氏曰：朱熹是一代大儒，陈亮是一代爱国英雄。正是在宋朝江山不保，国家危难之际，朱熹与陈亮之间展开了辩论，并曾劝陈亮放下自己的那种激烈言行，好好在书斋中修炼‘诚敬’功夫，做一个‘淳儒’。这段话便是他俩争论的一部分。人们说宋儒迂腐，于此可见一斑。宋朝江山的败亡，朱熹实在是有一大功的。

或疑聪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胜。如心所欲为，卦辞虽明说凶，说不当为，亦认作吉。若先不欲为，卦辞虽明说当为，亦认作凶。若去其私，虚己以听，何不逮古人之有。

清·张尔歧

《蒿庵闲话》卷一



有人总疑惑，现在的人为什么比不上古人聪明。我认为，那只是因为现在的人，私心太重。如果自己心里想干什么事，卦辞上虽然明明说是凶，说不应当做，他也会认做是吉；若是他自己心里先就不打算去做一件事，卦辞虽然明明说是应当做，他也认为是凶。如果能去掉人的私心，每个人都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别人，怎么会赶不上古人聪明呢？

曾凡氏曰：这话一点也不错。可是，怎么做到呢？

人心如止水，微风拂之，便易漾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挈紧一步。圣人罕言利。所谓利者，不必富贵利达，凡于身有安便处，皆当体认。此外纵一步，便骀骀入可欲境界矣。咨生质故懒；遇谋身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儿畏避学舍，因此亦得缓审事理，习久若性。数年来并懒言安乐境界，虽处困乏，觉天地甚

旷,人事甚静。心之所在,无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将至,与沟壑近也。夫沟壑非不可近之地,较心所谓涂炭者颇异。任天得之,循道处之,何殊丰养厚葬。常人以身安为乐,君子以心安为乐,咨虽未学,苟安吾心,袒跽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乐境也。诸友为谋田庐,使余年耕凿内,理非不可。然耕凿本无怀之业,而谋而为之,则怀必有所扰。又不得同心之侣共处朝夕,他日与祝丰祈稔之辈,日计赢绌,衰年余喘,是可惴惴。敢敬谢诸友,巾辍兹役,使吾以将尽之日,乘化短长,无所潏洄其间,似胜于饱暖终矣。

清·潘咨

《谢诸友为田庐书》



人心就像那平静安宁的水面一样，有一点微风吹拂，就会在水面上荡起波纹。治心的办法，主要在于理和欲相互矛盾争斗的交界之处。圣人很少谈到利。所谓的利，不一定是富贵发财之类，凡是对自己的身心有好处的，都应当看做是利。在这种地方放纵一步，就会飞快地滑到贪婪的境界了。我这人天生的懒惰，遇到为自己谋福利的事，往往就拖拖拉拉不抓紧，就像那小孩怕上学一样。这样一来，反倒对什么事都不着急，时间一长也就成了习惯了。几年来，我甚至连安乐这种境界都懒得提起，虽然自己生活得很困窘，自己倒是觉得天地宽广，人事关系也非常地纯净。心所寄存之处，没有什么外来的事物干扰，不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快要入土了。要说起来，沟壑下不是不能接近的地方，比起我们日常心理所谓“涂炭”的那种境界，只是另一种情境而已。如果我们顺乎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而生活，怎么死还不是一样呢？平常的人以身体健康安宁为快乐，君子则以心理安宁为快乐，我虽然学问不怎么样，只要能让我心理上觉得安宁满足，即使是光着身子冻死在路边上冰雪中，被人随便以一堆土埋上，那也是一种快乐的境界呀！各位朋友为我谋求田地和造房屋，想让我余年在田地中安稳地度过，这从道理上讲也不是不可以。然而，田居生活本来是不用操心的事情，现在各位费心替我操劳张罗办成此事，我心中肯定有所不安；另外，又不能和同心的伴侣一起朝夕共处。以后又要与那些整天祈祷，企盼丰收的人们一道，每天

计算着收获和支出，年老力衰，只想着怎么活下去，那情景可太令人不敢想像了。因此我在此敬谢各位朋友。请现在就停止这项工程，使我利用这即将结束的生命，进一步地体会生命的奥秘。只要心中宁静，没有挂怀之事，那就胜过吃饱穿暖了。

注 潘咨，字少白，浙江会稽人。性恬旷，工古文，有名当时。终身未尝，试，营家人生产。弟官广东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为置田庐，固辞不可。此篇《谢诸友为田庐书》即是申述此事。

四 道学语

“道学”的标准说法应当是儒学。但儒学是孔夫子的治世之学，而道学则是后人借孔夫子之名所传播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之所以被称为“道学”，是因为说教者总是以为代表了儒教的嫡传道统，以为自己的说教就是真正的“道”。

但无论是从实际生活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说，道学都是中国文化的没落，是儒教的没落，是中国传统文人与现实生活相脱节的典型表现。所有的道学语，都是高尚纯洁的，都是无比正确的，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是面向整个人类的未来的。他们可能把一些没有人生经验的青年学者引向不尚实际的人生之路，但对于道学本身原来所期待的，所谓“经天纬地”“经世济民”“参赞育化”之类人生目标和文化理

想而言，这些议论仅仅是些玄言式的纸上谈兵，是无用的空头支票。

与通常的废话、假话和闲话不同，道学语之所以有它自己的价值，原因在于，道学家们都是以无比真诚的心和一本正经的态度在讲废话。他们把这样的废话当做人生的宝贵经验和做人的行为规范，当做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象征。并要求别人也和他们一样，承认这些废话的价值，遵循这些废话的指导。于是，这些废话就成了一种具有象征地位的文化存在，成了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标准，成了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精神的一种珍贵蓝本。



事实上，我们今天也仍然不停地在说同样的废话，在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人生。只是我们自己有时不能认识或不肯承认这一点而已。就此而言，迂人迂语并不是古人的专利，而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一种纪录，是我们

自己的一面真实的镜子。

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乎？

清·姚鼐

《致袁枚书》



咱们学习儒学的人，生在程朱之后，是靠了程朱的指引才明白孔孟的道理的。程朱就像是我们的父兄和师长一样啊。那么，程朱的话如果有了失误之处，我们难道是必须听从的吗？程朱难道是真的不愿意让后人讨论他们的失误，纠正他们的失误吗？纠正是可以的，一面指出和纠正他们的失误，一面借机诋毁他们，嘲笑他们，那就像诋毁和嘲笑父亲与老师一样。而且，你自己生平不能做到像程朱那样光明高尚，而自己心里还

想与程朱比高低，争名次，这又怎能不被天下人所嫌恶呢？

曾凡氏曰：这是姚鼐写给袁枚的信。原因是袁枚放荡不羁，好诋毁宋儒，姚鼐给他写此信，以示谴责。这话本身不错，错在讨论问题的角度。明清以后，人们嘲笑宋儒，是一种文化态度，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学派。姚氏为桐城派主将，是老实做学问的人，所以无法理解这种态度。

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以汉经师为法，与宋儒未尝相戾，其学未为失也。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况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造立名字，挟汉学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凭借权势，阴鼓天下而从之。士大夫于是靡然风向，争趋汉学，其言六艺之言也。其学则孔孟之学也；所托者尊，所当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学太由是大变，宋儒之书能举其名者少矣。至于缙绅之徒，相诟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天下之祸，始于士大夫学术之变。杨墨炽而诸侯横，老庄兴而氏戎入。今之言汉学者，战国之杨墨也，晋宋之老庄也。夫杨墨老庄，岂意其后之祸天下之若是哉？圣人忧之，而杨墨老庄不知，此其所以为杨墨老庄而卒乱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离道，犹人之不可一日而离食。人日食五谷而不知其旨，

凡物之味皆可以夺之,然而一日厌谷必病,病久谷绝必死。今之言汉学,其人心风俗至如此,后之论天下者,于谁责而可乎?

清·孙鼎臣

(畚塘刍论·论治第一)



本朝开创时期的各位大儒,矫正前朝明代的失误,读书实事求是,力求考据明确,以汉代的经师为榜样,与宋儒也不相抵触。这时的学问,在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时,德高望重的名士贤人,遍布朝廷内外,都以实践为先,耻于夸夸其谈,风气淳厚 礼教受到推崇,号称是本朝的极盛期。后来时间长了,后学的人开始分门别户,找各种借口,立各种名目,以汉学为武器来攻击宋儒。同时又有那么一两个身份地位极高的人,凭借自己的权势,私下里鼓动天下的人跟在他们后面跑。这样一来,士大夫们都随波逐流,争着赶时髦去学汉学。他们谈论的是六艺,他们学的是孔孟之道;所托身投靠的人那么尊贵,自然没人敢于逆他们的意志而

行事；随便他们怎么样，都没有人敢提出批评和指责。天下的学术从此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宋儒的书渐渐地很少有人能举出其名字来了。以至于那些腐儒们，都互相拿道学作攻击诋毁的靶子。人心风俗，退化演变以至于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天下的灾祸，说是从士大夫的学术风气变化开始的。杨朱、墨子吃香，诸侯就强盛起来了；老庄的学说盛行，外族人就乘机而入了。如今那些大谈所谓汉学的人，实在就是战国时候的杨墨，晋宋时代的老庄。要说起来，杨墨、老庄又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学说竟能对后世造成那么大的灾祸呢？圣人虽然为此而忧虑，可惜杨墨、老庄自己却不明白，所以他们才提倡自己的学说，以致对天下造成了危害。如今，天下一天也不能离开道的指引，就像人一天也不能离开食物一样。人每天吃五谷而不知道它的甘甜，不论别的什么东西的滋味都可以压过五谷的滋味，可是，一旦哪一天人不想吃饭了，必然是生病了；生病时间一长，不能进食，必然就要死掉。如今谈论汉学，其人心风俗竟到了这种地步，后代那些探讨天下得失兴亡的人，究竟该责备谁才是呢？

曾凡氏曰：孙鼎臣是一位有学问的人。这段话原本也不算什么错。不过，孙公身为大清皇朝的人，居然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考据、训诂感兴趣吗？

处多事之秋而高谈理学，鲜不以为迂矣。岂知世之治乱，原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原于教化，教化原于

学术。正学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心不可得矣。是学术者，政教之本也。

……夫以性道之空谈，较见闻之赅洽，诚觉汉学实而宋学空矣。然亦思圣贤之学，果何学哉？非以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入事父兄，出事长上者耶？以身心之践履，较口耳之记诵，果何实而空也？又况文安训话，器数形名，为道所寓，不可以为道，讲求既精，反躬无毫末之涉。文为制度，宜于古或不宜于今，束发受书，至于槁项，讨论精详，临事不获一用。夫治闻殚见，著作等身，乃于天理民彝之实，身心国家之要，漠然初未介意，概乎其未有闻，此可谓之学哉？宜夫世教衰微，人道匮乏，士无气节，民不兴行，陵夷流极，以有今日。今则加以泰西新入，群为利诱，充塞害政，尤未知所底止。然则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图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则曷不仰法圣祖，提倡宗风，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今世之能为宋学者如倭仁、李棠阶，已为硕果之余，宜隆以师儒之任，责以教习之事。如古之胡瑗、孙明复，就成均以设科。如近代之汤斌，虽公卿可从请业。优崇其恩礼而郑重其事，以风示天下，豪杰兴起，四方风动，是在朝廷转移间而已。夫上行下效，捷如影响，君师合统，尤易见功。果能表章扶持，以承先圣，将正教昌明，邪说自沮。上礼下学，贼民自以不兴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雪国耻。臣之所请崇正学者此也。

清·蒋琦龄

《崇正学疏》

处于多事之秋还在那里高谈理学，恐怕没有人不认为是迂腐的。可是，人们是否知道，世事的治与乱，根源是在于人心和风俗，人心风俗又源于教化，教化又源于学术。学术的正统方向不明确，要想以学术来教化人民，促进风俗的改善，以求天下太平，那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学术这东西，原来是政治和教化的根本呀。



……要说起来，整天以性或道这样的空谈，来互相比较见闻的广博和狭隘，确实让人觉得汉学实在而宋学空疏啊。然而我也在想，究竟什么才是圣贤的学问呢？不就是学习怎样做人的儿子，学习怎样做人的臣子，在家怎样对待父兄，在外怎样对待长辈和上级呢？拿身心的亲自实践，同那种死记硬背的学问相比较，到底哪一种实在哪一种空疏呢？更何况文字训诂，或器物名称、形式等之类，是道所寄存的载体，而不是道本身；对这类内容研究得过于细致，对自己的真正修养反而毫无益处。文化作为传统，许多时候是适用于古代

而不适用于今天的。人们从小时候开始读书，至于衰老，讨论得无微不至，到实践中却一点也用不上。要说起来，装了满肚子的学问，写出的著作快顶着房顶了，可是对自然的道理，人民的生活，个人的修养，国家的前途等等，一切都毫不关心，问起来一点都不知道，这样的学问也算学问吗？这也就难怪如今的社会、世道衰退，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民心涣散，国将不国了。现在又加上西方国家新近闯了进来，以各种方式来引诱人民，邪气遍布各个阶层，损害了国家政治的正常运转，至今不知道何时和怎样才能结束这种局面。然而，真要想唤起人心，纠正风俗，以便建设一个太平的天下，除了崇扬正学以便使教化兴盛起来之外，别的再也没有好办法了。那么，为什么来摹仿效法圣人和先祖，提倡正经的风气，贬斥孔颖达、郑玄之流考据家，表彰二程、朱子那样的学者，排斥考据之学而倡扬理学呢？当今时代懂宋学的人，比如倭仁，李棠阶等人，已经老了，可以把他们抬高到师儒的地位，让他们从事教育后生学者的任务。比如，古代的胡瑗、孙明复，朝廷都是根据他们本人的能力和学术专长而设立的学科。再如近代的汤斌，虽然是那些身为公卿的人，也可以跟着他学习。只要朝廷非常隆重地优待这些人，非常正式地推举他们的地位，以此向天下表示朝廷的心意，那么，杰出的人才就会涌现出来，天下都会闻风而动。这些，只在于朝廷的一点表示而已。事实上，上行下效，变化的速度极快；而君王的意志与师儒的教导结合在一起，更

是特别容易见效。如果朝廷真能表彰和提倡正统儒学,以继承先圣,把正教发扬光大,那么,异端邪说自然就销声匿迹了。君王崇奉礼教,下面的老百姓都会来学习圣人的教导,坏人自己就无法生存下去;人民养成了孝悌忠信的观念之后,这种精神就可以用于保家卫国。我之所以请求皇上崇扬正学,原因就是这些。

曾凡氏曰:看此公先前言语,主张实用,似乎非常明白。到了后来却露出了腐儒本色:汤斌本是一个伪君子,两面派,连皇帝心里都很清楚。这且不说他。既是讲对国家人民有用,何以又回到程朱身上?特别是朱子,在亡国之际还与陈亮辩论,大讲什么“静坐”、“诚敬”,这算哪家的实用之学?

今世学者多以时艺为小道。夫时艺之视古文,诚有建楹之别,然在高人名士言之则可,有政教之责者不当言也。有明以来,以此取士,一代之公卿大夫,名臣循吏,皆由此出,乌可目为小道而不讲乎?且朝廷所以悬此取士者,非真谓时艺能得人,而工时艺者即可以治平天下也。任事者必有专精之志,强固之气,又明于圣人之理,详于先王之制度文为,然后充之以阅历,施展其才能,而后能泛应不穷也。应科目者,其志气期于必得,而又求理于四子,考名物于六经,苟如是矣,授之以官,使之阅历而展施焉,虽不中不远矣。

国朝制艺,康熙以前,宏厚精醇,故其时名儒辈出,理学昌明。……至于今日,则专取圆滑之调,填砌芜烂

之词，冀幸弋获，非特四子之义理、六经之典章绝不宣究，即讲章之章旨节旨，《八铭塾钞》之规矩准绳，亦复束之高阁，是国家例取不明理不读书之人以为公卿大夫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外夷之服，不亦难乎？

方今国势浸衰，强邻逼伺，老成勋旧，窃窃忧之。然内不求之于人才，外不求之于吏治军政，而徒汲汲于机器轮船，予则以为强国莫先于治军政，而吏治军政之修莫先于求才，造就人才莫切于振兴时艺。使应试者非读书明理不得科名，则人才奋兴，吏治清而民安，民安而财阜矣。将帅得人，则兵精器利，外患自消矣。或者以为时艺空言，其于治国安边，隔膜已甚。不知法，其文也，待人而行；器，死物也，待用而利。无奉法之吏，用器人，则机器之隔膜尤之时艺也。或者曰：时艺空而难稽，机器显而易考，此洋人所以强也。不知洋人之强，在用器之得人，非仅以其器也。以外国证之；荷兰、土耳其皆有机器，不免于败亡。而以中国证之，方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郭、沈、丁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而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以讲求夷务之心挽回风气，以制造机器之费造就书院之生童，则人才出而内安外攘矣。

清·朱克敬

《时艺论》

当代的学者们大都认为八股文是小意思。其实，



八股时文和古文比起来，确实有高下精粗之分。然而。这话让那些名流文士们去说是可以的，身负国家职责的官员们却不能这样讲。自从明代以来，靠八股时文开科取士，整整一代的公卿大夫，名臣循吏，都是从这个渠道培养出来的。怎么能把它视为小道，而绝口不谈呢？而且，朝廷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取士，并不是因为时文真的能选拔出有才干的人，或是说会做时文就一定是能治国平天下的人。做事必须是能有事业心，有志气的人，又深通圣人的道理，懂得先王时代的各种制度和传统，然后再补充一些实践经验，在工作中把他的才能施展出来，这以后就能应付各种复杂的情况变化了。那些去参加一定的科目考试的人，其目标是在于一定要考上，同时又从孔孟程朱那里学习人生的道理，从六经中学习考察各种事物的名称性质等。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就是给他一个官做做，让他在实干中增长知识和才能，虽然选择得不一定绝对正确，也差不到哪

里去。

本朝的科举时文,康熙、雍正年之前,文风淳朴,气魄宏大,所以那时名儒不断地涌现,理学非常兴旺发达。……等到了现在,却变成了专取圆滑风格,堆砌许多无用的华丽辞藻,希望能侥幸被朝廷赏识。不但四子的义理和六经的文本绝不研究,即使是考试用的教科书的章节大意,《八铭书钞》这种考试必备的常识规矩,也都束之高阁了。这不等于国家明明白白地公开招聘不读书不懂道理的人来做官吗?像这样子还想求得天下太平,和夷族的宾服,那不是太难了吗!

如今,国家的局势很危险,强邻在四周虎视眈眈,凡是老成的大臣和王公贵族都在担忧。然而,国家内不求招揽人才,外不求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只是一心惦念着那些机器、轮船。我倒认为,要想强国首要的是治理好军队和政治,而搞政治和军事最首要的又数求人才,造就人才的途径,又数振兴时艺最为急迫。如果能让那些来参加考试的人,凡是不读圣贤之书,不懂圣人道理的,都不能被通过。那么,人才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吏治就会清明,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老百姓安稳之后,国家财富就会积累起来;有了人才,将帅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得到了好的将帅,军队的战斗力就强大,外来的侵入自然就被平息了。有人认为,时文这种东西是空谈,对于治国、保卫边疆这种实际需要,隔得太远。这些人不知道,任何法规制度,最初都是一纸空文,都要靠人来执行;器物都是死的,要靠人去使用

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没有遵守法律的官吏，没有懂得机器的人，那么机器离现实的需要，比起时文来差得更远，隔膜更深。也有人说：时艺太空洞抽象，难以把握，机器非常明白，容易考察，这明摆着就是洋人强大的原因。可是这些人不知道，洋人之强大，主要是在于选拔出了合适的掌握机器的人，而不是靠那机器本身。以外国为例 荷兰、土耳其，都有机器，但却没有躲过败亡的命运。而以中国自己为例，当今懂得外国事务的人，没有人能超过李鸿章、郭嵩焘、沈××、丁汝昌等人的。这几个人都是制艺出身做了官的，对于政治时事一点也不隔膜，难道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性格或是本能就与别人不一样吗？这足以说明，道光以前的科举制度，并不影响人们学习真正的知识。由此看来，从时文中又何尝不能求得人才呢？拿出讲求洋务的心境努力挽回社会风气，以制造机器的费用去培养书院的学生，那么，人才就会不断地涌现，而国家也就得以安宁，外患得以消除了。

曾凡氏曰：朱克敬也算是近代名士，与洋务派诸公，特别是郭嵩焘等人关系密切，思想是非常开通的。但书生习气，一生潦倒。此处的言论足证其书生习气，他认为人比机器重要，要求重视人，培养人，标志着中国近代的文化改革已经由器物制度的层面，进入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但他提出的救世药方却是所谓的“时艺”，即八股文。这就如同某些小脚老太太一样，一面喝着牛奶，吃着面包，一面却不断唠叨着：不如窝窝

头好吃！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

宁可使子弟终岁不读书，不可一日近俗人。盖俗人开口便是一团人欲，易得坏人。

清·王豫

《蕉窗日记》卷一



宁可叫子弟一辈子不读书，也不能让他们有一次接近俗人的机会。因为俗人一开口就是一团人欲，太容易损害人的心理了！

曾凡氏曰：还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到亡国时也能为君尽忠，博一个忠臣孝子之名。

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经，不如读一章小学。

清·熊文端

引自王豫《蕉窗日记》

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经，不如读一章小学。

曾凡氏曰：王豫要自己的子弟读圣贤书，所以选择别人的话也选同样的内容。

或问：“鸡鸣而起，若未接物，如何为善？”程子曰：“只主于敬便是善。”愚谓惟圣人未接物时，何思何虑？圣人以下，睡觉时，合下便动个念头，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当行事，便来心上。只看这念头如何。若一念自好处想，便是舜边人；若一念向不好处想，便是跖边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却有所为，这又是舜中跖，渐来渐去，还向跖边去矣。此是务头工夫，此时克己更觉容易，检点更觉精明。所谓去恶在纤微，持善在根本也。

明·吕坤

引自(清)尹会一辑《吕语集粹》卷二

有人问：“鸡鸣而起，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与外物相接触，怎么行善？怎么使自己保持在善的境界呢？”程先生说：“只要心里总保持着敬畏之情，那就是善了。”我认为，那些人没有与外物相接触时，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必须思考挂念的？圣人之下的人，睡觉时，一会儿就有一个念头，或者是昨天自己所做过的事，或者是自己今天应当做的事，轮番地跑进自己的头脑中来。关键要看这念头是什么样的念头。如果这想法是从做

好事想起的，那就是舜那边的人，若是出现一点坏的念头，那就是盗跖那边的人了。如果心想的是善，而下意识、潜意识中仍有做坏事的意思，那就算是舜中的跖，慢慢地还得跑到跖那边去的。这纯粹是慢慢的修养功夫，在这个时候进行自我克制、自我批判，那效果会好得多，看问题也清楚得多。所谓去恶在细微处，行善在根本处，就是这个意思。



曾凡氏曰：吕坤是极开通狂放的人，而也不免说些道学家语。宋明理学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宋文帝尝谓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斋戒，不杀迫，以身殉于世，不获从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无劳民，则风雨顺时，寒暖应节，百谷滋荣，桑麻菀茂。如此持斋，斋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

为斋耶？噫！今世之愚民无论已，余尝见缙绅间，有手不离念珠，口不离南无，断荤止酒，持诵饭僧，作大功德，然而贪杀甚于盗跖者，岂未闻跋摩之语耶？

明·张萱

《疑耀·持斋》



宋文帝曾对求那跋摩说：“弟子总想实行斋戒，不杀生害命，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世界。可惜总也无法做到。”跋摩说：“你若能做到运用刑罚时不随便草菅人命，征用徭役时不让人民觉得劳苦不堪，那就会风调雨顺，四季正常，万物欣欣向荣，农业年年丰收。如果这样持斋，这种斋戒才是让整个世界都受益的大斋戒呢。为什么非得一顿不吃饭，或买一只鸟儿放生，那才叫斋

戒呢？”唉！瞧瞧现在这世上，那些愚民们就不用说了，我经常见到在那些有身份的人中间，有许多人都是手里不停地数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念着佛号，也不吃肉，也不喝酒，又念经，又给和尚布施，经常做大型的佛事。可是，就是这些人，贪婪之心，杀人害人之事，想的、做的甚至比盗跖还过分。是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听到跋摩关于斋戒的说法才这样的呢？

曾凡氏曰：宋文帝本人亲自聆听了跋摩的教导，但跋摩之所以对宋文帝说那番话，不正是因为他不能做到和没有达到那种境界吗？世间斋戒之徒本来就是为自己。并不是想为世人世界做什么好事善事。你拿做善人的标准去教导他，即使不是南郭先生对狼求情，也是对牛弹琴。除了骗骗自己骗骗别人，说自己对人说了一句有用的话之外，还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

使释迦生中国，设教当如周孔，是周孔书中，自有释教，儒者何必谈佛？使周孔生西方，设教亦当如释迦，是释教书是亦自有儒教，释者何必援儒？

明·张萱

《疑耀·儒释不必相援》

如果让释迦牟尼生在中国，他设立的宗教肯定也像周公和孔子一样。也就是说，周公和孔子的书中，自然地就包含着释教的内容。那么，儒教中的人，又何必也去整天谈佛呢？假使让周公、孔子生在西方，他们设

立的宗教也一定和释迦牟尼的宗教一样。即是说，释教的书中也包含着儒教的道理。那么，释教中的人，又何必总是引用儒教的观点和论据呢？

曾凡氏曰：谈文化不从文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的惯例？此言的前半句，很有些文化的眼光，揭示了环境的重要性。可是，后面的质问就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了。儒教之人谈佛，自是因为不得不谈。不谈佛便要丧失自己的精神规范地位，被人从文化舞台的中心赶走。佛教中人谈儒，也同样是为了使自己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特别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也同样是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力量。即如张公自己，不让儒佛互相引证，其理由不也是告诉人们，儒佛本是一家吗？

世之舍儒而学佛者，将谓其同于儒而学之耶，抑谓其异于儒而学之耶？既同于儒矣，学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异于儒者也，又不当身到于儒而学其非儒者也。即舍儒而趋佛，则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则此是彼非，不容强置也。

清·张尔歧

《蒿庵闲话》卷一

世上那些舍儒教而学佛教的人，到底是认为它和儒教相同才去学习的呢，还是认为它不同于儒教才去学习呢？如果它与儒教相同，学习儒教就足够达到正

道了，根本没有必要丢了这个去学那个；如果认为它与儒教不同，那就不应该自己身在儒教之中，却又去学习那不是儒教的东西。既然是舍弃了儒教去学佛教，肯定是儒教和佛教有所不同。既然双方有区别，那么，肯定儒教是对的，佛教是错的，它们就不可能被强扭在一起。



曾凡氏曰：此条正与上一条异曲同工。不过，似乎此条更自以为是而已。

五 懵懂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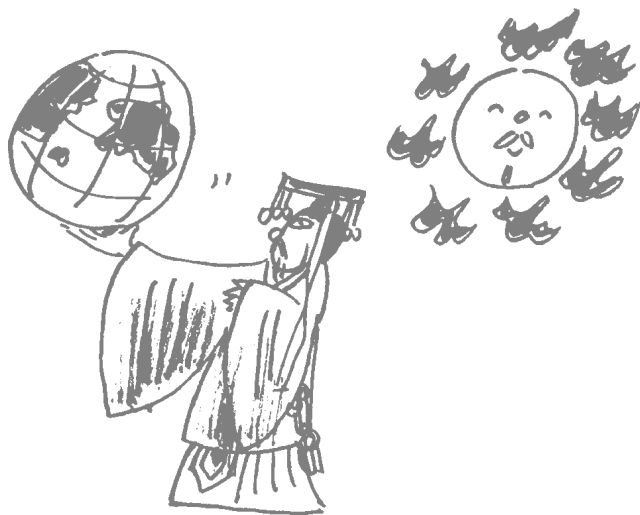
懵懂,就是不清醒,就是糊涂,就是浑。

但懵懂也有它的层次,有的人是小事糊涂大事明白,有的人则专门是大事糊涂小事明白。也有的人本来不是糊涂人,只是被自己的某种高尚的目标所引诱,反而变得糊涂了。这种糊涂,有时是自觉的,即为了实现自己期待已久的某种理想,或为了让别人都相信自己的某种信念,坚持去做或去说一些不可能的事;有时又是不自觉的,是被形势所引诱所左右,稀里糊涂就说出了傻话,做出了傻事,自己还洋洋得意。

自觉的糊涂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尚情操,是一种崇高的悲剧性行为;不自觉的糊涂,则是一种浅薄,无知,是人性弱点的集中展现,也是造成种种人类悲剧的基本原因之一。

但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懵懂就是懵懂，不清醒就是不清醒。人之所以会自找烦恼，之所以会在数千万年的文明之中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各种错误，正是由于许许多多的懵懂，正是由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不清醒。

所以，当我们在说别人迂的时候，也不妨想想自己的迂；当我们嘲笑别人的不清醒时，也不妨想想自己种种不清醒的表现。这里所记录的“懵懂语”，便可以作为我们自我反思时的镜子。但愿我们自己不犯浑，少犯浑！



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

矣。

夏·桀

刘向《新序·刺奢》

我拥有天下就像天上有太阳一样。你说，太阳会被消灭吗？如果太阳灭亡了，我就灭亡了。

注：桀作瑶台……伊尹知天命之至，举觞向桀说：“皇上不听我的劝告，我们的国家可是就要灭亡了。夏桀听了此话大怒，突然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声地笑着说：“你说的是什么鬼话！……”

曾凡氏曰：做臣子的迂在不知自己的身份，要代皇帝管理天下；而做皇帝的，往往迂在不知自己的天下实在是靠这些很讨厌的臣子们维持着的，桀是一个极端，而其他各种“皇帝”同桀一样地迂，以至愚者，正复不少。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

战国·孟子

引自清·尹会一《士鉴录》

上天是没有想让天下太平呀！如果真的想让天下太平的话，这个世界上，离了我还有谁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呢！

注：尹书原文说：是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

伐为贤，而处士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为臣于齐而归。喟然叹曰：“夫天未欲平天下也，如欲平天下，舍我其谁哉！”

曾凡氏曰：孟老夫子错矣！谁说天下不要平天下呢？只不过人家都在争夺生存权，你却偏要对人说什么“正人心、息邪念”，谁又有那些闲心去听呢？此言若在一场合可能是无人敢道的狂语，但它迂就迂在不合时宜，就如我们喝令景阳冈上的武松：你不要打死老虎，那可是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那武松保命要紧，怎么肯来听你的说教？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晋·王恭

《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非得是有奇才的人。只要能经常保持清闲没事，痛痛快快地喝酒，把《离骚》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称之为名士。”

曾凡氏曰：余嘉锡认为：“王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自恭有此说，而世之轻薄少年，略识之无，附庸风雅者，皆高自位置，纷纷自称名士。政使此辈车载斗量，亦复何益于天下哉！”王恭是魏晋名士之一，此言也确有魏



晋名士之风。然而，有人之狂是自觉的，不惟有政治的原因，有时还有哲学的追求。狂风化为世俗风气，化为时髦，则狂也就成了迂。王恭之言非错，错在他只求风流狂放，而不明了狂的真正文化内涵。故余嘉锡说他不学无术。可惜余公以一代大学者，亦有不透不通之处。魏晋文人之狂放，不能尽归之于附庸风雅，而须从当时的哲学与文化背景着手着眼。自称名士，固然有浅薄处，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还是为了获得可靠而不露痕迹的人身保障。由此看来，做学问若太实，也就陷入了迂的境界。

刚毅不解句读，而自负能文。其任云南按察使时，将任内各项公文，分类编辑，刊印成册，名曰《官场必读》，逢人赠予。其自序云：“余自信无学问，全凭眼光

挑选二三文人学士以资辅佐。是书之成，不可谓非余一生之心血也。”

清·刚毅

引自《近代稗海》十三辑

刚毅不懂句读、训诂的学问，可是又很自负地以为自己是做文章的高手。他任云南按察使时，把自己任内的各种公文，分类编辑，刊印成册，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官场必读》，见着人就送一本。他自己为自己的大作写的序说：“我自信没有学问，全凭着眼光挑选那么两三个文人学者给我帮帮忙。这本书能够编成，不能不说是我的一生的心血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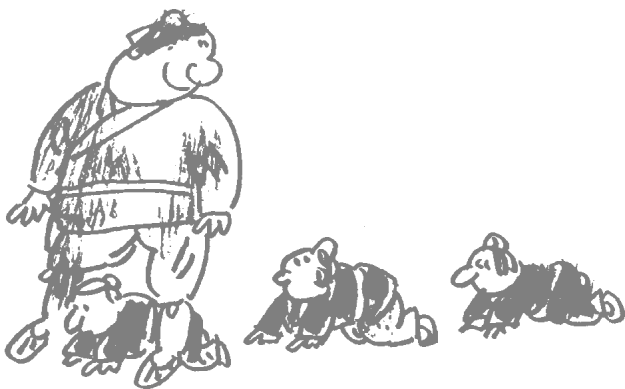


曾凡氏曰：刚毅此言似乎不好说是迂，只能说是愚。可是，历朝历代，从古至今，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之徒何曾少过？则此种言论说是迂腐也不为过，且真愚者少，而真迂者多多也。

官为民之父母，吾官之，诸君民也，是吾不啻为诸君之父，诸君亦无异为吾之子。父命子不敢辞，古有明训，诸君勉之。

近代·张怀芝

《近代稗海》十三辑



官是民的父母。我是做官的，你们都是民，所以，我也就是你们诸位的父母了，而你们也就和我的儿子没有什么区别。父亲有命儿子是不许推辞的，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矩。希望诸位牢记这一点。

注 张怀芝上将，为人粗鲁蛮横，遇事勇敢。一次，

他来到省议会，大陈兵卫，使一大群文弱的代议士，望而生畏。张登演坛为议员们演讲，说出了上面那番惊天动地的高论，众人只有面面相觑，不能置一词。

曾凡氏曰：天下就有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不知羞耻的人。所以，天下的事，很多时候是无法讲“理”的。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无所革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报国耳。”

宋·李沆

(明)曹臣著《舌华录》



李文靖李沆做丞相，非常稳重正派，没有实行任何改革措施。他曾说：“我当丞相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只

是不改变朝廷的各种法规、制度，靠这一条来报答国家而已。”

曾凡氏曰：中国人历来有一个极特殊的传统，做官不害人不犯法便是好官，便要吹牛，便要高升。以此来看，李沆的话倒也有道理。可是，如此一来，国家还要官吏干什么？特别是，人民还要官吏干什么？以一个官吏的身份说这种话，尚且无妨，可怕的就是人人都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

公曰：“某言既无状，今虽罢谏院而以美官见诱，是以贪夫畜某也。如朝廷用某言，则胜得美官矣。如言不用，虽万钟，亦不敢受。”

宋·范纯仁

引自《仁学规范》卷六



先生说：“我的言论既然不像样子，如今虽然罢免

了我的谏官职务，却又拿更大的官职来引诱我，这显然是把我当成一个贪婪无耻的人来看待。如果朝廷愿意采用我的意见，那要比给我一个高官美差好多了。如果不能采纳我的意见，虽然赏给我万钟俸禄，我也不敢接受。”

注：此公向皇帝进言，皇帝不采纳。他便上书给皇帝，要求把自己撤职，或加以惩罚。皇帝撤掉了他的原职，但却封了一个更大的官儿给他。别人都让他赶快就任新职，他却很委屈，坚决不上任。这段话就是他给皇帝的“回信”。

曾凡氏曰：此公果然豪壮忠直。然而却是大错。言官是什么？是代皇帝监察其他大臣行为的人，但绝不是代人民监视皇帝的人。范某居然想代天下人说话，又要皇帝心甘情愿地听从自己的话，岂非太迂了吗？

读此令人想起今日红得发紫的某大学者，居然说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的民主制度。不知是何居心？

定镇平（成）为大理院正卿，固不知法律为何物。民科推丞许受衡，刑科推丞王式通，亦皆门外汉，而笑话不可胜数矣。有一例：外省审检厅有疑义，电院请示解释者。向由毕业生出身之推事，或小京官拟答复稿。定见满纸日本法律名词，皱眉曰：“中国法律，偏要引用东洋奇怪的名词，殊不成事体。”爰谕各员曰：“嗣后拟

稿,毋得援用日本法律名词,违者惩办。”

清·定成

引自《近代稗海》十三辑

定成做清末的“最高法院院长”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民法科的许受衡、刑法科的王式通,也都是法律的门外汉,所以就闹出了数不清的笑话。有一个例子:外省的审检厅有什么疑难问题,来电报向院里请示,一向是由专科毕业的推事或其他小京官拟定答复稿。定成看见满纸都是日本的法律名词,皱着眉头说:“中国法律,偏要引用东洋那些奇怪的名词,太不像话了。”于是就通知所属各部门的官员:“以后再拟定文稿,不许再用日本的法律名词,违者一定要给予处分。”

曾凡氏曰:迂与愚向来不可分,此又是一例。

……如此价廉,物未必佳。

近代·唐绍仪

引自《近代稗海》十三辑

……这么廉价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货色。

注:唐绍仪住在天津时,上街买东西。见某洋行陈列的新式铜床,花样奇巧,光彩夺目,特别喜爱,就问价格。店员回答说:“价钱从一百到二百多元都有。”唐说:“这么廉价的东西,质量肯定不行。我那年在华盛顿买过一张这一类的床,花了二百块金币。当地的人

士还说不是上等货呢。”说到这儿，店员已经看出来这是一位大阔佬，就接着他的话茬说：“我们这儿倒是还有一张高级的床，要三百多元，先生可以先看一下货，然后再决定是否要买。”说着就指给他看另一张床。唐四面仔细地看了看，点头说：“这张床还凑合吧。”于是，掏出三百元把那张床买走了。其实，那张床只值一百元而已。



曾凡氏曰：曾见报纸上登一条消息，说是一位店员，把自己的旧裙子挂在店里推销，四十元一条，好些天卖不出去。这位店员灵机一动，把价格改成了四百元一条。没想到，还是那条旧裙子，居然第二天就卖出去了。可见人的思维，有时候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的。

陆春江曰：“各省纷纷设立武备学校，独文备学校尚付阙如。朝廷文武并重，予此次陛辞，已奏明两宫，拟将湖南高等学校改称文备学校，仅设经学、历史、国文、修身四科，为各省倡。一俟拟定办法，奏请实行。君速将该校内容，切实调查具报。”

清·陆元鼎

引自《近代稗海》十三辑

陆元鼎对手下的学务公所总办姚文倬说：“各省现在纷纷设立武备学校，只有文备学校还没有。朝廷本来是文武并重的嘛！我这次在京城告辞，已经向太后和皇上汇报过了，准备把湖南的高等学校改称文备学校。学校里只设经学、历史、国文和修身四科，算是作为各省的表率吧。一等到各项办法都定好了，我就汇报给皇上，开始实行。你赶快把那个学校的详细情况调查一下，写个报告给我。”

注：陆春江做湖南巡抚时，问学务公所总办姚文倬：“学务处有多少学生？多少教师？”姚答不上来。陆便有此一说。姚使劲解释没有这么一种学校，并说，如不听就干脆辞职不干了，陆才放弃他的奇思妙想。

曾凡氏曰：此亦非迂，实在是愚。中国近代的改革，有许多的内容便是如此这样开历史的玩笑的。

戴文诚公(鸿慈)为清末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抵

华盛顿，偕端方等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于白宫。罗知文诚系中国法部尚书也，问之曰：“闻贵国有改订法律之议，已实行起草否？”文诚答曰：“此事为侍郎沈家本专责，从事编纂久矣，余自始未过问也。”翻译者为吾国驻美使某公，将“未过问”一语不提，盖恐为罗斯福所讪笑也。

清·戴鸿慈

《近代稗海》十三辑



戴鸿慈是清末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到华盛顿后前往白宫拜访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知道戴是中国的司法部长，就问他：“听说贵国有修改法律的说法，不

知现在开始起草新法律了没有？戴回答说：“这事归我们的沈家本侍郎专门负责，已经搞了好长时间了，我自始至终从未过问。”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听到这位大臣的话，便悄悄地把“我自始至终从未过问”几个字给省略掉了。因为他怕罗斯福笑话。

曾凡氏曰：身为司法主管官员，却声称对本国的法律修订一无所知，而是交给自己的手下人在搞，还自以为很潇洒，中国如何不亡！

六 博识语

中国古代的学者似乎都不爱钻研枯燥的纯科学问题。这不能说是“中国人”的特点，而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儒教文化是以伦理为中心的，讲究的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做事。所以，如果有谁不埋头苦读圣贤书，而去钻研与人格道德没有紧密联系的科学问题，就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至少是没有出息。

在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所有与道德、与基本的生存问题没有紧密联系的事物，都被视为无用之事无用之学。所谓“奇技淫巧”，就是包括科学和工艺在内的一切非实用的事务的总称。

但汉代以来，儒教的训诂传统又教会了儒生们钻牛角尖。他们心中装着天下事，肩负着治国、平天下的历史重任，自以为应该无所不懂、无所不能、无所不会、

无所不管。因而又养成了好发空论的习惯。上至朝廷大事，下至老百姓的一举一动，向前追溯到三皇五帝，向后究诘至今天早上张三与李四辩论，都在他们的批评和议论范围之内。

若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辩论或钻牛角尖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它可以促进人们对某些平时不大关心的问题的认识。可惜，从董仲舒到朱熹，一心只在教人如何识别圣贤之道，从不要人考虑自然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即使是谈到天、地、自然、宇宙，谈到“物理”、“数学”，也都把它们化成了伦理道德的学问，化成了如何体会天意的灵魂修养的捷径。一颗流星坠地，先要想到是否因为自己触犯了天意；一只羊生了五条腿，先要想到老百姓是不是要造反？出门看皇历，修坟看风水，仿佛人是为了日月星辰而活着，又好像真有一个不吃不睡爱管闲事的“天地”每天每时在瞪大了双眼看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结果，人们所辩论的事物，以至那辩论的结果，反而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地遥远。当许多入振振有词地向这个世界宣讲他们的最新发现时，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反而让更多的人跟着他一起变得更加糊涂了。

显然，这里的“博识语”并不是在展示现代意义上的博识，而是展示一种自以为博识的迂腐的文化心态，也可以说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种病态的思维惯性。

张衡转载候风地动仪之制，而云“验之经事，契合若神”……夫地在中，静者其常，动者其偶，当其动，即使地有灵亦不能自知，而能传于人所制之器乎？仪之至今传者，莫如浑天观其罗列星宿天球，机之运动在人，非能因时自为旋转，上符天之春秋冬夏也。太史家据以测验其精否自有本术，仪无权焉。且所测者，亦不过朔望、薄蚀有常之度数。若彗孛、飞流之属，虽精于术者亦不能知。而况于铜制之器。地之动亦犹天星之有彗孛、飞流。据有常之度数尚不能于仪以知其变，而谓地之块然无端倪可测者，转可使仪之预以告焉，必无是理。

清·张宗泰

《质疑删存·辨〈汉书〉地动仪之妄》



《张衡传》上记载了‘候风地动仪’的构造，并说‘拿事实相对照，相互契合得非常神奇’……要说起来，地

是在天之中。静是地的常态，动是它的偶然现象。当地动的时候，即使地是真有灵气的也不能自己知道，它又怎么可能传给人所制造的仪器呢？（古代的）仪器至今还在流传的，首先要算是“浑天仪”了。看它罗列星宿天球的方式，机器的运动是由于人的操纵，而不是自己自我控制着，到时候就转到一定的方向，而又正好符合天上的春秋冬夏各种季节。太史这些人测验天地运行的情况，自有他们自己的特殊的技术，仪器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仪器所能检测的，只不过是日月的朔望之期和日食、月食等有规律的现象。像那些彗星、流星之类，虽然是特别精通此术的专家，也无法测出。更何况像铜做的仪器呢？地的运动变化，也就像彗星和流星一样，根据正常的规律还无法用仪器测出它们的变化，而认为大地这样浑然一体的、毫无踪迹可循的事物，反而能依靠仪器来预告它的变动吗？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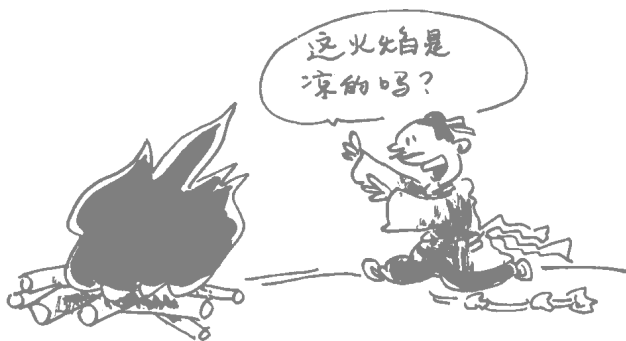
注：据报载，河南新乡的一位工人已经成功地复制出了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并被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一些外国元首。

曾凡氏曰：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一向是把科学当做意识形态的附庸来对待的。天上的秩序就是人间的道德样板。所谓“天人合一”，强调的就是人间的一切都符合天上（即自然界）的规律，而天上的规律又是按人间的价值观被规定的，即道德化人格化伦理化了的。毫无疑问的是，人不可能预先知道的意图。因此，现代

人所理解的那种“客观的”自然界是不能被把握的。上面这段话虽然没有明说“天人合一”，但其基本的思维方法还是相同的。

世所谓凉焰，恐无是理。盖阳能制阳，故水可以为汤；而泉亦有温者，阴不能制阳。若极盛则克之矣，不能使之从其性也。夫阳之成形为火，而焰则火之余也，恶得凉。

明·梅纯
《损斋备忘录》



世人经常说什么“凉焰”，我看没有那么一种道理。本来，阳气能够克制阴气，所以，水可以被烧开。不过，泉水也有热的，那是阴气不能克制阳气，若是阴气太旺盛，那么也同样能克制阳气，不可能让阳气无限制地生长。火是阳气的可见状态和形式，焰是火的附属形式，它怎么可能是凉的呢？

曾凡氏曰：这话比有些人批评诗人的句子不合理更荒唐。凉焰，只能是一种心理感觉，不可能有哪一位先生认真到这种地步，把它作为科学发现来对待。钻牛角尖，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迂腐思维方式之一。这位梅公选择这个话题来谈论，本身就是迂腐，是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传统怪病之一。

井田者，古今老师宿儒习称之，而少年迂而讳言之。讳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遗意，其附会之而习称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盖其事与田猎相表里，徒论井田而兼论田猎，则井田之精神不备；而公经纬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王者镇国家，抚百姓，欲以长子孙，而杜奸诡，则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气好胜之民，则劲悍难使，势必至于毒民而后已。圣人以为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里田猎，乃圣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穷，所谓合之则双美，而离之则两伤者也。……盖尝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猎之阖闭纵横，屈伸进退，其变迺于今不可胜记。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为势也。后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勋之本政，其井田纯用局者也；狩于崇丘，讲武于平乐，观阵布兵于骊山之下，其田猎纯用势者也。时异世殊，必举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执死势而复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残势败者也。……即当时但称师尚为善将，而不称姬公为善兵。呜呼！圣人之深于藏法，

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后知兵之所以莫测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明·陈继儒

《狂夫之言》卷三



井田这种形式，古往今来的学者大师们都很赞叹，只是后来的年轻人却都顽固地回避它。那些回避的人，当然是不了解周公以井田求天下太平的意思；而那些随梆唱影跟在别人后面称赞井田的人，也并非真的很了解井田。井田，实际上是兵法之祖啊。要说起来，这件事与古代的田猎是联系在一起，互为表里的。只讲井田而不同时论田猎，那么井田的精神就不会被理解；这样，周公为姬氏谋划经营八百年江山的苦心也不

会被揭示出来。

……帝王管理国家，安抚百姓，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能长久地安享天下；而为了不被坏人篡夺权力，扰乱天下，就不得不用兵打仗。战争是不吉利的东西。因而，把战争加在血气旺盛的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就更强悍强劲，难以管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害了老百姓。圣人认为，以战争这种事去为害天下，不如以它来教育天下；以战争来教育天下，又不如把它隐藏在天下人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井田与田猎互相为表里，乃是圣人以极高明的手段隐藏其战争艺术，使战争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使它们互相分裂，造成人类生活的危害。

……我曾作过一种比喻：井田制，就像是下棋的棋局。田猎当中的开合、纵横、进退、伸屈，其各种变化数不胜数，都是模仿着下棋那样来安排布局和把握形势的。后代的柳宗元论封建，林勋强调以政为上，他们所说的井田都是只是看到了井田的形式（局）；在崇丘打猎，在平乐讲武，在骊山观阵布兵，那种所谓的田猎，又只是单纯地看重了井田的精神（势）。时代不同，社会不同，而坚持要恢复所谓三代之法，让君主为难的人，实际上只是重复古人的旧棋局；改变田野和道路格局，恣意游山玩水，打猎钓鱼，那就是局势已经残败无可挽回了。……就在当时，人们都只是知道称赞姜太公懂战争，会带兵，没有人知道周公是懂战争艺术的人。哎！圣人那么善于隐藏自己的智慧，竟能到了这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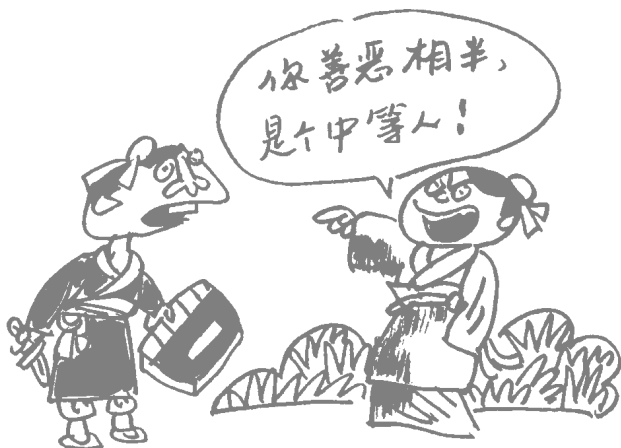
步吗 从来懂《易》的人不随便谈论《易》，懂战争的人不轻易说起打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懂得，战争是神秘莫测的。所以我说，井田这种事物，本来是古今兵法的老祖宗啊！

曾凡氏曰：陈某为明代著名的狂士之一，此言又选自所谓《狂夫之言》，偏偏我却把它作为迂腐的代表，陈夫子必老大不高兴。然而我自有道理。此言之迂，不在其观点，而在其论事的思路、论述的方式。井田就是井田，兵法就是兵法，你要拿它们互相印证未尝不可，却偏偏要说古人如何如何，这便是中国士人们的老毛病：我祖宗比你强多了！其实你就大大方方地说一句：还是井田好！别人不是更佩服你的见识高人一筹吗？

温公元：“性堵，人之所受于天以生者也。善与恶必兼有之。是故虽圣人不能无恶，虽愚人不能无善。其所受多少之间，则殊矣。恶多而善少者为愚人。善多而恶少者为圣人，善恶相半者为中人。不学则善日消而恶日长，学焉则恶日消而善日滋。”此论以学为主，立意甚善。但云圣人亦有恶，则非也。圣人而有恶，何以云上智下愚不移乎。应云有善而无恶者，圣人也 善多而恶少者，贤人也 善恶相半者，中人也 恶从而善少者，愚人也。语方无弊。

清·申涵光
《荆园进语》

司马光说：“人性，是人从天那里接受来的，必然是善恶兼而有之。所以，虽然是圣人也不能没有恶，虽然是愚人，也不能没有善，只是在各人之间接受的善恶多少有所差异而已。善多而恶少的人，就是圣人；恶多而善少的人，就是愚人；善恶各半的人，也就算是中等人。不学习，善就日益减少，恶就日益增长。坚持学习，恶就会日益减少，而善则日益增长。”这种说法是以学为主，出发点的意思很好。但是说圣人也有恶，这就不对了。要是圣人还有恶，那又怎么能说是‘上智下愚不移’呢？应该说是有善没有恶的人，是圣人；善多而恶少的人，是贤人；善恶相半的人，是中等人；恶多而善少的人，是愚人。这样的说法才算没有毛病。



曾凡氏曰 所以才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一说。这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由来。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全顾？有偏胜亦视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来不可不养，气节不可不学，学术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随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瓘、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弊于权数，李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汝曹方读唐书，当以是类求，则益其他琐细与无用之空文不足多讲。徒乱人意尔。

引自《石林避暑录》

一般地说，人才有四种类型。德量为上等，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才能又次之。一个人如果想成才，这四种条件都应该具备。如果比较这四种才能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才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不过，一个人又怎么能面面俱到呢？某一方面稍强是可以的，不过也要看他在向哪一方面发展。所以，道德修养必须要培养，气节也必须学习与锤炼，学术方向必须要正确，才能必须要杰出。如果能有这样的决心和理想，那么，随便在哪一方面发展起来，都不会是中等以下的人物。唐代的人中间，房乔、裴度是以德量取胜，宋璟、张九龄是以气节著称，魏瓘、陆贽的学



术就较高,姚崇、李德裕的才能比别人强 可是,姚崇的弊端是太看重权术,李德裕只根据自己的爱憎办事,结果反倒是让自己的长处变成了自己的人生累赘。你们最近正在读《唐书》,应当以这些人作例子,举一反三,那么,其他琐细和无用的空文就根本不再多讲了。再讲也是只让你们的思想更混乱而已。

曾凡氏曰：这些话从原则上说都是对的。只是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考察,就见出某些古怪了。至少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是‘做人’第一,德性第一,人格第一。历来的读书人,也都把道德人格的培养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可是,也就是从孔子开始,中国人把一切科学的、技术的、实用的知识和能力,都放在可有可无,甚至是受排斥、受非议的地位。最著名的一种说法,是把所有与读书、种田无关的事称为“奇技淫巧”。其结

果不仅闹得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愈来愈落后,中国的科学人才愈来愈不受重视。至今,所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说法,其背后所隐藏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他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虽然他没有能力,但这个人是个‘好人’!”

春秋纪事,非以用字为褒贬,但据事正名,则褒贬自见。如下杀上为“弑”,此杀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犹酒之不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饮。苟舍之而不曰弑,则非下之杀矣。故凡杀上者必以弑。书非恶其杀上,而故书弑字以示贬也。故曰‘春秋正名’,盖正其本然之定名耳。圣人岂假智力于其章哉。

明·梅纯

《损斋备忘录》

《春秋》记载各种事实,不是靠选择字眼儿来表达作者的褒贬之情,而是为了反映事实,用最恰当的字眼儿表示出来,让人从事实中体会出作者的态度。比如,下级杀了上级,用一个‘弑’字,这是以下杀上的最准确的称呼,不能因为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就像对于酒不能说‘吃’,肉不能说‘喝’一样。假如舍去这种说法不用,那么,所表达的就不是下级杀上级了。所以,凡是下级杀上级的,都是用这个‘弑’字,这样的写法,不是表示反对某人杀上级,而只是用这个弑字表示出对这种行为的贬意。所以人们说“春秋正名”,意思就是

说它纠正和确定事物本来应有的正式称呼。圣人怎么能借智力去做什么文字游戏呢？

宋时百官奏章，皆手自书进。贾学士直孺为谏官，有所条奏，仁宗识其手书，每嘉赏之。古人凡在仁籍，无不工书者。故一切章奏，皆手书之。非惟得敬君之体，且机密事亦不至宣泄取败。今人多不能书，故不得不倩于书史耳。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书，而行草间见。今古帖中尚有载者。

明·张萱

《疑耀·古章奏皆手书》



宋代时，百官的奏章，都是自己亲手写好，再进呈给皇帝看的。贾直孺当谏官时，每次进呈奏章，宋仁宗认识他的手迹，经常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古人凡是在朝中做文官的，没有不会书法的。所以，一切的章奏都是亲手书写。这不仅符合做大臣的人尊敬君主的礼节，而且真正机密的事情，也不致因转抄而泄秘坏事。现在的人大多不善于书法，所以不得不请那些懂书法的文吏代笔。不过，古人的章奏书稿，不一定都是用楷书写成，有时也用行书和草书。这些，在古代流传下来的帖子中还可以见到。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为近古。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诮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后，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词谚语，颂圣祝寿，喧嚣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呜呼！谁秉国成，非此读书作文者邪？何以至此极也。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何以故？师严然后道尊。举世师紫阳者近二百处，一旦以为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渐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败坏国事，何足异乎？尝为设一喻：童子之敢于忤师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

关乎世运,推言之,乃知其非廓。

清·张尔歧

《蒿庵闲话》卷一

明初的学者们,都尊奉二程和朱熹的学说,文章写得非常深刻明白,有成就的学者不断涌现。国家的政治和老百姓的心态,都被认为是近于古人的风格。自从(王阳明)‘致良知’的说法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敢于提出与程朱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还以异教的理论来解释六经。于是,议论一天比一天新奇,文章一天比一天华丽,这种风气慢慢地波及影响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在乡塾中偶然有人读朱熹的《四书集注》,竟然被人传为笑柄。《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两部明初公认的经典著作都被束之高阁,社会上甚至根本就找不到这两种书了。庚辰年以后,文章最低级杂乱,能堆砌古书字句的还算是上等的;老百姓的俗语土语大白话,吹捧的言论、祷告祝贺的言语,都被写进文章中去。圣贤们那种认真的高深的道理,没有人再理会了。结果,就导致了甲申年的大变乱。呜呼!这个国家是靠什么人支撑着呢?难道不是这些读书写文章的人吗?为什么能弄到这种地步呢?要追究其根源,实在是出于对程朱的那点不尊重的念头,一点一点地发展而来的。为什么呢?师道尊严,然后才使正道受到尊重。整个社会尊崇信奉紫阳大师学说的有二百处,即使以后觉得他的学说不对,不再信奉他,可是人心已经受到他的

迷惑，慢慢地就会不再信仰孔孟之道了。作为一个人而不信孔孟之道，他的心里所装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欺骗上级，虐待老百姓，败坏国家大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曾经作过一个比喻：一个小孩，如果他敢顶撞老师，他就必定是败坏他父辈家产的人。文章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业，从小孩的例子来看，可以知道这种说法不是夸大其词了。

有土地，要之耕而种粟以养人，乃宜。今以种果实，只做果子吃了，种糯，使之化为水饮之，皆不济事，不稳当。

宋·程颐

《程氏遗书》卷十五



有土地，首先要用来耕耘种粮食，以便养活人，这才合适。现在呢？或者拿土地来种水果，只是当果子

吃了；或者是种糯米，让它化成水（做成米酒）喝下去了，都不是正经用途。这样做很不合适。

雕文镂刻，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饥之本也；女工伤，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无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之有也。

汉·王符

(清)申涵煜

《省心短言》

雕刻、纹身之类的事情，对农业有损害；华丽的服饰和布匹，对女工有损害。农业受到损害，就是人们挨饿的原因；女工受到伤害，就是人们受冻的原因。吃不饱穿不暖而能保持不做坏事的人，天下没有。男男女女的人们，都互相攀比着，夸耀自己的打扮，这样的人如果能不走入淫邪之路的，从来没有过。

曾凡氏曰：中国人最典型的一种观念是反对所谓“奇技淫巧”，也就是任何与农业无关的事情都在鄙薄讨伐之列。单就日常生活而言，这种观念也不无道理，但作为一种通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便导致了一系列的畸形的社会后果和历史后果。所以，看这段话，必须把它当做一种文化宣言来看，而不要看成是一般的生活经验之谈。

引用书目

1. 《史记》。
2. 《文选》。
3. 《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
4. 《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5. 《新序今注今译》卢元骏注译，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6. 《唐语林》(宋)王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7. 《雨窗消息录》(清)朱克敬著，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8. 《明儒言行录》《四库全书珍本》第三集。
9. 《千百年眼》(明)张燧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0.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11. 《南北朝新语》(明)林茂桂著,中国书店影印本。
12. 《清人说荟》台湾华文书局影印。
13. 《李贽》福建省图书馆等编印,1975 年印行。
14. 《名山藏副本》(清)齐周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15. 《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
16.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17. 《庸闲斋笔记》(清)陈其元著,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18. 《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 《明清文人清言集》(日本)合山究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20. 《语林》(明)何良俊著。
21. 《舌华录宋琐语》(明)曹臣、(清)郝懿行著,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22. 《焦氏类林》(明)焦竑著。
23. 《彞勺编》凌扬藻编。
24. 《古籍》(明)杨慎编。
25. 《宰言》(明)马中锡著。

26. 《都公谭纂》(明)都穆著。
27. 《阅史鄙视》(清)李堪著。
28. 《谭苑醍醐》(明)杨慎编。
29. 《涉史随笔》(宋)葛洪著。
30. 《通史它石》(明)仇俊卿著。
31. 《闲中今古录》(明)黄溥著。
32. 《县笥琐探》(明)刘昌著。
33. 《读书札记》(清)徐志问著。
34. 《孔氏谈苑》(宋)孔平仲编。
35. 《蒿庵闲话》(清)张尔岐著。
36. 《疑耀》(明)张萱著。
37. 《古言类编》(清)郑晓著。
38. 《群碎录》(明)陈继儒编。
39. 《枕言》(明)陈继儒编。
40. 《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41. 《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版。
42. 《名臣经济录》四库全书珍本二集。
43. 《仁学规范》四库全书珍本三集。
44. 《历代名贤确论》四库全书珍本三集。
45. 《宋元学案》中华书局本。
46. 《明儒学案》中华书局本。
47. 《二程集》中华书局本。
48. 《野客丛书》(宋)王楙著,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小序/曾凡

“漫画人生智慧书系”是一套关于中国人的人生智慧的文化书系。这套书的内容选自中国古代典籍，反应了中国古代各阶层人士对于人生、社会的种种态度和认识。本书系力求小处着眼，从一句话看一个人、看一种现象，从一句话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以文字为主线，以漫画为引导，图文并重，图文并茂，可欣赏，可品味，可消遣，可珍藏，对于忙碌的现代人不失为一种上佳的精神补品。

这套书的选题是在几年前由范炯先生提出来的，命名为“掌上文库”。范炯是中国出版界极有才华、极有前途的青年编辑，曾经为内地和台湾省的许多家出版社主持策划过受读者欢迎的图书选题。不幸的是范炯英年早逝，这套书也就搁置下来了。

今年春天，我与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赵向毅先生偶然谈及这套书，赵君大感兴趣。于是择日邀约漫画家王林一同商谈，遂决定改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以现在这种方式出版，名称亦改为‘漫画人生智慧书系’。

范炯当日曾为‘掌上文库’写一小序，文字无多，兹录于此：

“掌上”二字，取义双关。曰一握在手，便携便读，老少咸宜，人人得益。曰千秋烟云，尽收掌中，不须钩力，文库入笈。取其小而便，取其精而宏，名为出版之新着，实承文史之旧序。所谓“掌上千秋史”是也。

印书贩书，读者为上。读诗读史，议言议行，三教九流，皆在其中，申中华文化之大旨，集国粹国宝于小书。虽雕虫微思之属，亦宁静致远之寄，不求闻达于上，只期垂青于众。果如所愿，吾辈苦心至矣。是为序。

辛未夏范炯谨识



迂言臆说

迂者，拘泥固执者也。譬如在下，盛夏酷暑，人家都跑到北戴河避暑休闲，我却躲在屋子里爬格子，平生第一次憋出来满身痱子，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自以为乐在其中。这便是迂也！明知这迂人之迂言乃是最无用的废话，却又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翻书查资料，一条一条地把这些废话搜罗起来，纷纷加以批注。这批注本身便又是迂言之一例！做那无人愿做的事，说些无人愿说的话，这不是愚又是什么呢？

但迂与愚毕竟不是一回事。“愚”是愚蠢，是糊涂，是大笨蛋，但“迂”则是难能可贵的、执著的、正确的，有时还是高尚的。

清代的陈遇夫在其《迂言百则》的自序中说：

迂言者何？善言也。善则何迂乎尔？言人所不言也。人所不言而言，言而善，则何以迂？非所当言也。身为公卿，可以升黜人，为方伯将帅，可为赏罚进退人，以是而言，言出而应千里，下令如流水。匪然，不怒则笑之。故曰迂也。或曰：此非迹言，先民之言，谁得而迂之？曰：古乃所以迂也。随地转移之谓风，情欲趋向之谓欲，风变欲易，代异世殊，执古绳今，是迂之尤也。曰：“然则孔孟古之书也，而不迂之，何也？”曰：“不敢也。勒为典，著为令，朝以是教，乡以是学，由之取尊荣，非之蹈明罚。故有行违无貌戾也。”曰：“然则谈仙说佛，此诚迂也，世故不迂之，又何也？”曰：“是不同。释氏言因果，思果报也；道家言感应，冀福应也。譬投饵取鱼，非能舍饵，利得鱼也。若夫正其谊，利则不谋；明其道，功则勿计。世所急也而迂之，故闻者以为迂也。……”

由此而论，迂人的言行，在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最起码在动机上是无可非议的。这种可贵的高尚的迂，是一种精神上的迂腐和执拗，是文化上的不成熟。

不过，这只是迂言的一个方面。迂言的另一特点是以假当真。不是那种执拗地对虚假的和虚幻的真理的信任，而是纯粹由无知而产生的狂妄。

譬如读者可以在后面看到的某种夜郎自大式的言论和夏桀所谓：“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

日亡吾亦亡矣。”这样的所谓迂言，便可以分别命名为“愚人愚语”和“浑人浑语”。

那么，迂人迂语的价值何在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能够从这些迂人迂语中看到一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呢？

首先，透过对这些人的言行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怎样地把人的灵魂塑造和改造成一个空壳，知道中国古代的士人和一些忠臣孝子是怎样在抽象的官方哲学的引导下步入精神的歧途。

也许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妙的特点，那便是主流文化与民间意识形态的隐隐约约的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对抗的关系。

一般说来，主流文化的基本理论架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另一个则是民间的价值理想。这其中，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价值观总是有冲突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解决方式之一，便是调和。为了使民间大众承认官方意志，统治者便要首先使自己所提出的价值秩序带上不可怀疑不可抗拒的公理的属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官方意志的公理属性是以“天人合一”来表达的。具体地说，就是把自然秩序伦理化，人间化，再由此而使人间的秩序显示出一种自然的属性。这样，帝王的意志就变成了所谓天的意志，帝王定下的规矩就变成了自然本身的法则，人民对帝王的服从也就变成了对自然规律的服从。于是，在一种哥德尔式的怪圈中，官方的意识形态就在不知不觉

中变成了主流文化的基本形态。

但在另一方面，民间价值观并不真正地被官方意志所同化。人们在理论上似乎承认了官方所描述的秩序结构，而在实际生活中，仍遵循着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样，官方就不得不采取某种权变的措施，把民间所推崇的人生样板吸收进官方的价值结构中去，让他们也成为官方价值的一部分。

由于这种冲突与调和的普遍存在，文化便处于永恒的变动中，社会便因此而不断前进。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那些隐士、侠客、高人、狂士及各种不被官方承认的民间英雄之流。就代表了民间的价值观，代表了社会历史文化向前发展的要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狂’，即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不合规矩、不守秩序，就是现代社会学所谓的‘越轨’。

与此相对，我们这里所说的迂，也主要是一种文化表现，即人格、精神和思想的迂腐，即文化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对于官方意志的盲目信任和崇拜，缺少独立的文化品格，把主流文化中那些虚幻的、虚拟的价值标准当成人生的实际标准来看待。

大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信条为标准尺度的。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社会和文化理想，但也是一种与官方意志混合为一的东西。迂人的突出特点之一，即是把这种被统治者利用了的的东西当做天地间原有的法则来看待。比如，许多儒家信徒要求皇帝如何如何，以为皇帝一定要听自己的劝告；或者听了皇帝在